一五一十周刊

NO. 147
2014年3月28日

人·群

月末版“个体与群体”第三期



编者的话

到今天（2014 年 3 月 28 日）为止，台湾反服贸风潮已近两周。一家知名网站制作的相关专题用寥寥数语描述事件：“3 月 18 日数百名反对服贸协议的青年学生占领立法院，并一直与警方僵持。3 月 23 日，2000 人攻入行政院。”在那一刻，这群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不同性别，平时作息、爱好、性情大不相同的台湾年轻人，都有着一个统一而模糊的名字，叫做“反服贸的青年学生”。人性个体的千姿百态在某个时间点被隐去，取而代之的是趋同的单一属性在群体中绽放，在那一刻 2000 个人变成了同一个人，一个人分身成为 2000 个人。

其实不需要群体事件这样特殊的时刻，我们就能在世间的各个角落发现群体的单一面目：广场上数以千计的踩着统一舞步的民众、网络游戏里成千上万组队杀敌的玩家、兴奋高唱同一首歌的演唱会现场……而在一些更为特殊的时间段里，人们经历苦难、折磨、快乐、欣喜的命运，不约而同展现出同样或喜悦或悲伤的脸庞，比如同性恋大游行，比如奥斯维辛集中营，比如三年饥荒，比如文化大革命……人类总在某个瞬间主动亦或被动地投入一群人，在其中体味更为复杂的组织架构与共通情感，无法自拔。

群体一般显现出比个体更为强大的力量、智慧和影响力，在《乌合之众》一书的作者勒庞看来，在人类悠久的信仰崩塌消亡之时，群体的势力便成为惟一可匹敌的力量，而它的声势还会不断壮大，“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与此同时，集群又表现出相较个体更为极端的品质，狂热、沉迷甚而失智，个体在进入群体后每每被认为丧失理性乃至人格，倾向于把复杂的问题转化为口号式的简单观念，“倾向于将自己的理想和偏执赋予十分专横的性质。”

不过，勒庞的看法也受到不少挑战，群体的理性与非理性探讨不绝于耳。无论是带来强大的力量，或者将人推向低能，每个人都在某个瞬间主动亦或被动的投入一群人，在其中体味更为复杂的组织架构与共通情感，无可回避。

本期一五一十周刊月末版继续“关系与交往”的话题，谈一谈作为个体，我们不可摆脱的群体因子。我们的好奇，来源于几个十分简单的问题：看到偶

像喜极而泣粉丝在想些什么？冲入行政院的瞬间学生们在想什么？红卫兵冲进教室殴打老师时在想些什么？看着同类被虐三缄其口的奥斯维辛囚犯在想些什么？

“个体如何融入群体”、“个体为何产生出与个人大相径庭的气质”、“个体在群体中到底有什么样的得失”，月末版试图通过这三个部分讨论个体与群体的关联，这当然只是一个浅尝辄止的探索。在挖掘个人与群体关系的过程中，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了解自身——作为人类，我们何以有如此多不为自己所知的面目。

1510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周刊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录



将本刊分享至：










⊢引子⊣

服贸运动中的青年

（资料来自黑色岛国青年 facebook）

【丝袜小姐（乐团，受访者为主唱小龟与贝斯手 DuDu）】



1.为什么来现场？

一开始受邀，随时间渐晚，怕大家精神不济，在本来是没有表演的时间，主动再加一场。

2.要求是？



主唱小龟表示她的要求是希望能退回重审，她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意见，但这么重要的事这样去处理，不公平。

贝斯手 DuDu 表示：最重要的是，他们不尊重程序，不尊重法律，服贸影响民生经济走向，却如此处理，是反民主又幼稚的行为，是威权的作法，是开倒车的作法。政府上任来一直是这种作法，人民忍到到今天爆发出来只是刚好，我们还算温和，希望他们回去反省。

3.想对大家说的话：

主唱小龟：希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但有的时候，语言也是会构成暴力的，要保持清醒才会有判断力，民主不是仅有互相表述意见，还要能互相尊重。

贝斯手 DuDu：我们在立法院阻挡警察，喝酒只是刚好，不过只是在里面喝酒……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写他们的事。

【「论文写不完也没关系。」－－－陈廷如、张忆棠、菜芽的故事】



我们有长期抗战的打算，如果活动维持半年，我们就支持半年。为了这个延毕也没关系，为了这个论文写不完也没关系。虽然春假后就要交论文了，但是在这个时间点，我们更要跳出来。

〖廷如〗：

我觉得不要去分什么鹰派、鸽派。去分的人其实已经在分化学生力量了，我们的要求是一样的，只是手段不同。不过，我希望去做这些事情时，要更有计划性。



昨天的事情，还是希望能不流血就不流血。我妈昨天还有打电话过来，希望我静坐就好。可是，我们或许有决心在这里半年，但就算半年过去，这里的人只会越来越少。有点担心这里沦为情感分享会，政府一直还是不去处理。还是希望大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别让自己受伤。

野百合学运时只有几千人，可是李登辉就愿意出来和学生沟通。现在马英九却跳过我们，直接向媒体发表无关痛痒的声明。为甚么不能来立法院和学生面对面？

「搞社运」、「搞学运」应该是上一世代的名词，到了这个民主时代还要搞社运，在我看来很痛心，但我们的政府还活在上上一个时代。

〖忆棠〗：

昨天行政院的行动，学生的出发点没有错，虽然行为违法。现在有太多人选择沉默，太多人太中立，太多人觉得可有可无。大家都怕死，但一群人人牺牲了自己，去希望大众注意到这件事情。

为甚么事情会变成昨天那样？学生的出发点是什么？还不是马英九过了六天还不给我们回复。如果继续下去，就算给他六年，他也不会给我们回复。我身边有很多来自台商家庭的人，服贸对他们很有利，可是对其它产业呢？

大陆的能量正蓄势待发，或许现在我们学生还有一些优势，但以后呢？有人会说：「那你们就提升你们的竞争能力就好啦。」可是事实上呢？香港的年轻人不努力吗？香港大学多难考？他们也是很认真很努力的人呀，可是香港的情况是台湾人想要的吗？现在或许看不清楚，但时间一拉长就会清楚了。年轻人要站出来为自己的未来发声。

〖菜芽〗：

这全部就是一个良心的问题而已。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不过，做人真的要有点良心，我们家是台商背景，在服贸中可说是既得利益者，但是这钱赚得下去吗？每个人有不同的人生目标想达成，有些人想赚钱，有些人追求历史地位，有些人追求小确幸，但至少不能忘记自己的良心，不能为了自己的追求去伤害别人。越有权力的人，越有能力的人，越要去照顾弱势。

警察有他们的义务，穿上制服就有他们的责任，但是驱离方式可以再理性一点。就算很累了，也不能把学生当作发泄的管道。如果长官说两个小时内要驱离，你可以凭着你的良心慢慢把学生抬走，虽然可能会抬到早上，但起码不会弄到流血事件发生。



学生没有多什么，就只是有一颗心而已。希望我们长大以后也不要失去自己的良心。如果没有良心，活着跟死了没有两样。

陈廷如、张忆棠、菜芽。中原大学商业设计研究所三人组。在路旁举着亲手做的牌子，久久不放。

【不能在击垮敌人之前，就先被彼此击垮了。—— 陈昊宜的故事】



3.18：

三月十八日晚上，我和第一波进入立法院的伙伴们在防弹玻璃后席地而坐。四周很暗，我跟着大家喊口号，配合领头同学的调度。后来大家打开防弹玻璃门锁，鱼贯进入议会。

其实当时我只是期待我们的行动能引起媒体关心，因为对于媒体几乎完全不报的服贸议题，我们没实在有别的方法了。没料到竟意外攻下了立法院。但至少也藉此让大家开始了解服贸议题。

十九日凌晨警察四五次夜袭，我在议场内很害怕，但「既然进来了，就一定要守住」的想法支撑着我们。

3.23:

我们大家排队走进去，没有冲撞；大家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没有冲突。我待在门口疏导人群，请大家坐下。

后来我们收到将有镇暴水车、催泪瓦斯、警棍的消息；我们想撤出，但是发现群众斗志高昂。我觉得戴着大声公和蛙镜等物资的自己，好像有责任留在现场协助、保护民众。不久，有伙伴从二楼掉下来、开始有学生被往外拖——现场的群众还有老人与小孩，不希望有人受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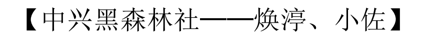
撤离的动机更紧迫了。然而撤离的同时还是有人涌入，我们没有权力控制群众，但不管他们愿不愿意撤，我希望能够协助他们。有伯伯大骂我们做抗争的怎么可以往后退？其实我也觉得：我不想输，我们怎么可以向政府低头？但是安全第一，伙伴们还是决定撤离，回到立法院。

其实我们已经很成功了。这次运动对群众而言是很好的公民教室，我们开启了讨论的契机、引发大家对话。藉由思辩，我们的动机与价值愈来愈清晰了。社会运动的结果很重要，但无论结局，单看过程，我们早已是赢家。

前几天，社会上出现鹰派或鸽派的争论，我认为这是很有价值的讨论——路线一定会有分岐，各有优缺，但我们要做好充足的交涉与分工，不要被分化，往共同目标前进。

「我们都不是敌人。 我们不能在击垮敌人之前，就先被彼此击垮了！」

现场有很多人像是在观望，但我不指责这些人，至少，你已经站出来了。只要你用自己的方式关心，只要你站在行政院、立法院，我不会要求每一个人都要一样严肃、认真。希望大家来这里感受一下气氛，每个人愿意参与社运的深度都不一样，真实的社会里什么人都会有。要思考，知道自己在干甚么，才能接受别人的质疑跟挑战。要思考，才知道往哪里走。


【中兴黑森林社——焕淳、小佐】



1. 为什么到现场参加反服贸？

A.这个案子本身不可行，何况还违反程序。台湾人的生计都掌握在政党高层手里，因为国民党的利益交换就牺牲台湾人的生计是不公平的。并且服贸协议关乎我们国安，政府应该摊开服贸协议在阳光下，让国人自己检视把关、维护自己的权利，捍卫民主。

2.为什么关心服贸议题？

A.基于未来的就业考虑。我们这么多大学生毕业以后并不会每一个都继续深造当学者，有很多人会选择进入服务业，而服贸协议最直接冲击的就是服务业，当中国劳力进入以后会导致工作短缺。并且台湾人与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不同，也会导致冲突。我们的农业也会受到冲击，台湾本地的小农会越来越弱势，小农会因为竞争不过大资本企业导致通路被垄断，无法生存。像是香港，中资进入以后投资房地产，买空卖空，炒作土地，虽然GDP增加了，但是实际上没有投入劳动创造劳动价值，只是假象的经济成长。

3.请问你们的要求是？

退回服贸。废除恶法。反对土地滥收。直接民主。

【北大翻墙社——叶瑾瑜】





1.为什么参加反服贸？

A.我觉得有两点，其中一点是程序有问题，另外一点是反对自由贸易。自由贸易虽然名为自由但是实际上却让大部分人民变不自由，这份协议只对特定政治团体与大财团有利，对劳工冲击却要很后面才看到，这在 WTO 已经看到了，何况是跟中国签订，这样的经济是大资本家与政治高层会获利，以剥削台湾人民来累积财富，服贸一过，台湾与中国的劳工都会被剥削。

2.为什么关心服贸议题？

A.因为大家毕业出去都是劳工啊，我又没有有钱有势有政商关系的父母。

3.请问你的要求是？

打倒资本主义。

【辅大黑水沟社——麦兜】



1.为什么参加反服贸？

A.自由贸易的本质就是伤害劳工。台湾不管跟美国、欧洲、斯里兰卡还是哪个国家签协议，自由贸易就是让资本家得利，只有资本家的钱在流动，资本家重复剥削劳工，劳工还是没赚到什么，服贸协议伤害台湾的劳工同时也伤害中国劳工。

2.为什么关心服贸议题？

A.异议性社团是个坑，进去就出不来了。行动是基于思想，建立台湾最重要的就是民主价值，捍卫民主！跟劳工站在一起！

3.请问你的要求是？

国民党要反省。支持劳基法第 28 修法。学费不要涨。支持多元成家。废死刑，支持司改。反课纲微调、还原历史真相。

【香港城市大学——李进熙】



1.为什么参加反服贸？

A.我想把现在台湾的情况带回香港，激励、感动香港人，让香港人勇于争取一些东西，另外也是因为觉得台湾学生很勇敢所以想支持。

2.为什么关心服贸议题？

A.香港有个 CEPA，跟服贸差不多，带来了经济影响，香港的小店都没了，现在都变成很大的连锁的知名品牌的店铺卖很贵的东西，这些店的顾客是大陆人，现在香港都没有自己

特色的东西了，不希望这样的事发生在台湾身上；台湾有自己的文化、艺术，我觉得都很好，不希望它消失。

3.请问你的要求是？

香港政府对于抗议的民众采取不回应政策，希望台湾的政府不一样，可以展开公开的讨论、协商、对话，跟人民取得共识。

【回到目录】



┣一个人与一群人┫

陈斩竹：我国的中老年广场舞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陈斩竹，知乎网友，业余撰稿者

“

他们的工作很多都无比单一无趣，几十年也没有什么升职空间。少了办公室的宫斗乐趣，多少的谋略智慧无法彰显。他们迫切需要打破原有的工作社会禁锢，走出家庭，去他们熟悉的人群中。在他们的邻居、同事、各种熟人里用新的技能和博弈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改朝换代。也许你当年是我的领导，但现在在广场舞的团体里，就是一个新人，得重新接受组织的考验和教育。多少工人阶级大有翻身农奴的解放的快感。

”

你以为他们是去锻炼身体吗？ No ！ 孩子你太天真了，就像你自己声称买 Ipad 是为了看电子书和公开课一样。广场舞这件事情也分为说服自己的表面理由和驱动自己的深层动机两部分。

说服自己表面理由很多，健身是最主要的一个，还有散心等等。但孩子，不要被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迷惑了，真相只有一个。。。 先进一段视频，请收看《后宫刘大娘的 1905》

【手绘故事】后宫刘大娘《1905》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I1Njg3MTQ0.html

See？ 广场舞也是这么的波诡云谲，腥风血雨。刘大娘和赵大爷以及我母亲大人都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在插叙里我再插叙一个我娘亲口叙述的故事。作为厂区广场舞扇子门五大分舵之首的向阳小区分舵领舞助理（二把手），我娘一直备受邻居阿姨的爱戴和拥护。领舞的是厂工会退



下的王阿姨（我叫阿姨其实很多孙子都上小学了），年轻时是叱咤厂区的风雨人物，专业功底过硬，年近花甲还可以随时给你下个一字马的那种。

王阿姨一心为了带领扇子门冲出厂区走向世界，参加由芒果卫视举办的全省广场舞大赛，无奈分舵人才凋敝，除了她和我娘其余都是些只会跳最炫民族风跟着甩胳膊甩腿的游兵散勇。经常有小老太太因为跟不上节奏学不会新动作而被领舞变相“开除”团队的情况。一时民怨四起。我娘一方面要小意逢迎领舞继续带领大家走向更广阔的舞台，一方面又要安抚团结群众，每次跳舞回来甚是苦恼。我当时看问题太过表面，以为广场舞只是一项一般的中老年文娱活动，完全没有领会到无数中老年朋友前仆后继乐此不疲的精髓。

于是劝我母亲大人玩得不开心的话，就多走几步路去其它小区玩。哪知我娘听后几乎激动得要跳起来，仿佛我是劝她通敌卖国一般。引用其原话：“这里都是多年的老邻居老姐妹，大家一起玩就是图个就是图个知根知底。要是去其它小区跳，找不到说话的人还是其次，被他们知道了，还不背地里唾沫芯子淹死我。” 一声长叹之后说，“唉，要是能把大家团结起来就好了。”

我实在遭不住我娘那忧国忧民的哀怨眼神，心想老子好歹也是管理咨询出身，几个老太太还搞不定。于是跟我娘出谋划策，中间略去无数让我大跌眼镜的波诡云谲，腥风血雨，虽然没有视频里这么恐怖，但是各种心思确实很纠结，最后我娘到底是冰雪聪明一点就通，借助某电视台拍摄外景机会，成功策反其它小区的骨干成员加入，并划分片区，将高手竞技区和锻炼区分开。一时间各路舞林高手乃至场外高人纷纷以加入向阳小区广场舞比赛为荣。

我娘也玩得不亦乐乎，每天吃完饭就像打了鸡血一样，过去当精神领袖。还跟我进行价值观输出说，很多人推选她当领舞她都婉言拒绝了，因为领舞树大招风，迟早会被人比下去，到时候灰溜溜地多难堪，还不如团结群众服务大家。（我觉得她应该是想垂帘听政当精神领袖直接把控领舞推选吧，还是特矜持特受爱戴那种）。再后来我娘不断有新的想法，好多我都更不上节奏了。比如开设周赛和季赛，还可以组队，有新舞教学和编排团队，音量控制监督委员会之类。

----------------------插完毕

Anyway，广场舞的形成是具有深刻社会学人类学历史文化背景。就像有人喜欢唱 K 有人喜欢打 LOL 刷魔兽一样，绝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我们的父王母后们，经历了文革那个动乱的年代，享受过集体的温暖也经历过集体的创伤。后来他们结了婚，养了我们这些二世祖。各种陈谷子烂芝麻的破事荒废了他们的青春岁月。到头来好不容易有点钱有点闲了，突然没啥好做的了，这是多么无奈的一件事啊。



他们的工作很多都无比单一无趣，几十年也没有什么升职空间。少了办公室的宫斗乐趣，多少的谋略智慧无法彰显。他们迫切需要打破原有的工作社会禁锢，走出家庭，去他们熟悉的人群中。在他们的邻居、同事、各种熟人里用新的技能和博弈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改朝换代。也许你当年是我的领导，但现在在广场舞的团体里，就是一个新人，得重新接受组织的考验和教育。多少工人阶级大有翻身农奴的解放的快感。

再说了，老一辈的人熬了多年各种人生哲学和智慧在儿女身上已经说干了讲厌了，儿女不在身边，需要重新投入集体中去实践自己的人生观价值感。有爱拼才会赢的，争着领舞，有云淡风清的，笑看各种精彩狗血的剧情，也有我母亲大人这样有节操有理想的还要利万物而不争其实是想当精神领袖的。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和意义。

朋友，你还记得对着电脑痛骂猪一样的队友，三路被推在家里挂机吗？广场舞团队的大爷大妈们绝对比你开黑更上心、更刻苦、更夙兴夜寐，所以他们波诡云谲，腥风血雨只是为了体验一下超神的快感！请支持他们吧。

被围观群众的热情吓到了

补充说明一下，家慈是一个婆婆妈妈心地善良有点小虚荣小纠结的普通退休人士。绝壁不是视频中大爷大妈之流。她老人家从来就是春风化雨润泽万物，绝不蝇营狗苟冷艳腹黑。特此申明！

我娘在微博上发现此文之后很甚是愤愤，说我存心篇排她。好吧，视频明明就是夸张的黑色幽默，不是白岩松老师的新闻 1+1，这点应该都可以 get 到的吧？

另外视频是由网友制作上传，原创团队在片尾，不用私信问我如何做的了。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揽尘：传销十一天见闻录（十四）“突破自我”

揽尘，图书编辑。

就是这一次谈话，把我的心理防线推到即将垮掉的边缘。任何事物，只要你怀着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去观察，都会发现其合理性，都会发现其可取之处。你怀着这种态度去考察一个最残暴的君王，也能发现他的残暴也许是源自内心的不安全感，也是值得同情的。更何况，我所面对的，是传销这么一个已经发展了很多年、拥有自己完整的理论系统和组织系统的组织？

时光回溯到我刚去东莞，骗我去的朋友周周带一个人到公交站接我，那人姓刘。中午我们一起吃的饭，吃饭时姓刘的那位貌似随意闲聊般问我：“你有理想吗？”

对认识不深的人，我向来不谈理想之类的话题。对于这么一个严重而宏大的词汇，我不愿敷衍，也不愿随意言说，说出来徒遭误解，没有意义。所以我就半开玩笑地说：“我的理想是拯救全人类。”

本来吃饭时闲聊，说者无心听者也应无意，交谈不过是鼓动一下空气的震动以避免太过安静的尴尬罢了。谁知道刘某听我这么说，竟然严肃地说：“你要想拯救全人类，先拯救拯救我和小周吧，让老板给我们多发点工资。”

察其行，观其言，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有些尴尬，嘿嘿一笑糊弄过去了。本来以为这不过是个偶然的小插曲，后来才发现，在传销组织里，没有一句话、一个字是偶然的，所有偶然后面都有人为设计的痕迹。

六七天后，我依然坚持不加入组织，他们连续调来二三十个主任经理之类的人物都没把我说服，眼看我就成了传销组织里光荣的“钉子户”。说到这里再插一点不是题外话的题外话，因为我在跟他们的主任谈的时候，有时候说到哲学之类，他们把握到我是个勤于思考、爱好哲学的“好孩子”，为此特意调来一个据说很有哲学造诣的主任。



——这也是传销组织里的一个套路，那就是找来一个能在你最擅长领域里把你折服的人，打击你的自信心。这里的潜台词就是：比你厉害多得多的人都进来了，你就别拽得二百五一样了，趁早加入吧。

我怀着无限的恭敬和期待等来了此人，那位哲学主任先生一坐下来就问我："你看过《狼图腾》吗？"我一听之下觉得这位哲学主任先生的思路还真不平常，人家聊哲学从柏拉图笛卡尔康德叔本华开始，或者从意义死亡存在真善美进入，他却是从《狼图腾》进入。我告诉他我高中时读过，然后继续聆听他的教诲。接着他就开始大谈他所谓的哲学，说人类有两种性格，一种是农业性格，一种是游牧性格，后者以狼为代表，等等等等，我就这么晕晕乎乎地听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总算听出了他的结论：弱肉强食的法则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合理的。

我有些无语地告诉他，黑格尔说过"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只是说存在的东西有其存在的原因和其存在的必然性，然而这个"合理"不能等同于善、正义。弱肉强食是社会中的一个客观现象，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它存在着，就对其持一种肯定和赞同的态度。若是这样的话，希特勒也存在过，莫非希特勒也是值得赞同的？

他听了之后一愣，然后很严肃地说："你再好好了解、学习一下行业，然后选择离开还是留下。说实话我有些欣赏你，行业里面很少有能谈哲学的人。好了，你出去吧。"我也很严肃地跟他说了声："谢谢！"

低着头走出那间屋子，我有一种忍不住想哭又想笑的冲动：原来所谓哲学，就是丛林法则啊！

我讲这个故事，是想说传销组织对我"已被洗脑却未被完全洗脑"有些无奈了，以至于无所不用其极。这个时候，那位刘某来了，我才赫然知道，原来这位刘某竟然是位经理级别的人物（是不是真正的经理我现在不大敢肯定），然后，她就以"老熟人"的身份（去车站接过我，是以为"老熟人"）把我拉到屋子里，做最后的努力。

面对面坐好，稍微寒暄几句，她就说道："我记得第一次见面，你就说自己要拯救全人类，现在有没有想好怎么拯救？"

听到这句话，我在心里苦笑一下，嘴上也苦笑着说："那不过是玩笑话，当不得真的。"

"那你将来要做什么"她的攻击正式开始。

"我目前在做文化工作室，这两年把文化工作室做起来，一来是赚点钱糊口，二来是为社会提供几本真正的精神食粮，算是公私兼顾吧。两年之后的事情现在还不能确定，要看到

时候的情况，有可能继续在文化行业发展，也有可能考研继续读书，就做个学院中人。”这个问题他们问过很多遍，所以这套说辞我基本上能倒背如流了。

这个问题只是个引子，她继续不紧不慢地问：“你就没想过别的生活方式？没有想过走别的不同的道路？”

“想过。但是想来想去，还是觉得我目前走的这条路最适合我，一来是能养家糊口，二来是能做点有意义的事感觉人生有价值，三来是自己喜欢。所以别的路虽然精彩，但我也只能无奈地错过了，毕竟一个人的一生不可能把所有的路都走完。”我自认为这番回答无懈可击。

“你真的想过了吗？真的只有这条路适合你？还是你从来就不敢选择别的路，只愿意呆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你知道什么叫画地为牢吗？”这几个问号问得很有劲道。

我那时觉得，这位刘某问出的问题，倒比那位哲学主任先生说的东西更像哲学，毕竟只要你抓住一个点不停地追问，连问十三个为什么，最后肯定都是巨深无比的哲学问题。

这个问题也有些莫须有的味道，谁能真正明白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我知道我在很多时候不明白，每个人的心理都是一个黑洞。我就说：“也许是如你所说吧，毕竟一个人更愿意呆在自己习惯的环境里，对陌生的东西有一种潜意识里的排斥。”

她沿着朝向胜利的道路继续发问：“你觉得这次来到这里，是不是一个机会？”

我点点头。这一点毋庸置疑，无论是好的机会还是坏的机会，总之它肯定是一个机会。

“是机会就不要轻易错过。我知道你很坚定，你觉得自己一直过得挺好，突然被朋友用那种方式叫过来了解行业，心里肯定不好受，所以你要问问自己：你已经全心全意投入这个行业、毫无偏见地体会过这个行业的好了吗？我敢说你没有，你一直想着怎么跑出去。”停了一下，她看到我在沉思，就接着说：“既然你对自己当初的选择很坚定，干嘛不试着先把以前的想法抛到一边，认真体会这个行业，当你真正了解清楚这个行业之后，再把你以前的选择拿出来对比，这样的对比才是公平公正的，那样做出的选择才是你内心真正的选择。”

她的这一番话说到了我心底，真正把我说动了：是啊，既然我那么坚信自己的选择，干嘛不好好了解这个行业呢？我这么固执地想走，是不是因为对自己之前的选择、对自己一直以为会坚定地走下去的路，其实很不自信？

我告诉自己：自信不仅仅表现在自己身上，更主要的表现在面对敌人的态度上。我就好好地了解你们的行业，看看你们到底是什么名堂。



就是这一次谈话，把我的心理防线推到即将垮掉的边缘。任何事物，只要你怀着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去观察，都会发现其合理性，都会发现其可取之处。你怀着这种态度去考察一个最残暴的君王，也能发现他的残暴也许是源自内心的不安全感，也是值得同情的。更何况，我所面对的，是传销这么一个已经发展了很多年、拥有自己完整的理论系统和组织系统的组织？

于是我发现我心动了，我开始幻想如果拥有了这笔钱，如果有了这两年的磨练和锻炼，我有可能在商界崭露头角，叱咤风云搏击商海，在现代人的战场上体现自己的价值；我开始幻想两年以后，无论我到中国的哪个地方，都有在传销里认识的朋友，能不揣一文钱就环游全国……

欲望一旦被激发出来，就像是在秋后的草原上放了一把火，想要再扑灭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我开始了第一次动摇，开始真正试着问自己：也许我可以在“网络营销”里打出另一片天地？

说到这里我就不得不感谢一位朋友，感谢老天安排了一次美妙无比的误会。正在我徘徊不定的时候，一个在广州的朋友打电话给我，知道我在东莞之后，就半开玩笑地说：“你要小心，东莞可有好多……”说到这里她停了下来，没继续往下说。在那种情况下，我理所当然地把省略号里的内容理解为“传销”，看着旁边几个虎视眈眈盯着我的人，我生怕朋友把“传销”这两个字说出来，赶紧把话题扯开。那时我才想：这个网络销售很有可能就是传销，传销那玩意儿咱不能干。虽然说还不是百分之百肯定，但一失足成千古恨，宁愿错走，不愿错留。就此，我才下定最后决心之最后决心：死也不加入这个组织。

我出来之后，在从东莞去广州火车站的汽车上打电话给那个朋友，跟她说“谢谢”。然后才知道，在她的本意里面，省略号里面的内容是“色情行业”，她本来就是想调侃我一下，没想到闹出这么个误会。感谢这个误会。

一两天后，刘某又把我拉到房间里面，问我考虑得如何。面对她期待的眼神，我审慎地说：“我认真体会过了，也认真思考过了，我还是觉得……很遗憾，我不能加入。”

她的眼中闪过一丝不经意的失落，嘴角的微笑却没有丢掉，友好地问道：“为什么这么决定，能说说吗？”

我当然不能把心底的那点东西抖出来，只好耸耸肩，说：“虽然这个行业很好，也很有吸引力，但是仔细衡量过后，我还是觉得原来的那个行业比较适合我。就这样。”

“这不是你内心真正的想法，”她丢掉嘴角的微笑，突然严肃地说，“你还是在敷衍，既是在敷衍我，更是在敷衍你自己。”

“不会这么容易就被她看穿了吧？”我心中忐忑地对自己说，不过面子上还是装作很无辜。我辩解道：“我跟毛主席保证，绝对没有敷衍。选择哪个行业，从事哪条道路，主要是看哪一个更能满足自己内在的愿望，满足自己的价值感。也许，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不是一个是非对错的问题。你站在你的角度，你是对我；我站在我的角度，我是对的。矛盾的双方都可以是对的，因为我们双方都有各自判断对错的标准，标准不一样，答案自然有差别。这是很正常的。”

为了过关，我不得不跟她详细解释，我心说：我都把问题挖到根子上了，你还能怎么办？

没想到她还真有说辞。沉吟了一下，她说：“你说的很在理，我也赞同。但是，你怎么知道你的价值观是对的？没有试过从别的角度来考虑，而依旧站在原来价值观之上思考，你当然会做出这样的判断。但是如果你的价值观错了，怎么办？你能保证你的价值观是正确的吗？”

这一问，让我瞠目结舌，好半晌，我才说：“没错，我无法百分之百肯定我的价值观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只能凭借我已经形成的价值立场来判断事物；如果我放弃了这个立场，我还是我吗？我还怎么去判断事物？那是没有可能的事。”

这下她来劲了，侃侃而谈道：“凡事没有试过，都不要说不可能。在来这儿之前，你觉得两年赚一百八十万可能吗？你觉得不可能。但是来这儿之后，你又觉得可能了。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你以前的判断体系就是错误的，是片面的。所以，你要抛开你所谓的价值观，真正进入这个行业，了解这个行业，你才能真正明白这个行业的魅力和好处。否则，你就是自己给自己划了一个圈，永远也不敢跳出来，看不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精彩的东西，也永远没有机会接触和了解这个真正精彩的世界。你觉得是不是这样？”

我被她说懵了，真被她说懵了。她说的确实很有道理，一个人只有跳出去，才能看到更多。很多人一生这也不敢那也不敢，只知道呆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一生庸庸碌碌无所作为。而只有那些敢拼敢闯敢尝试的人，只有不断突破自我超越自我的人，才能真正有所成就。我也一直很羡慕那样的人，他们勇敢地尝试过，努力拼搏过，哪怕最后没有成功，但这辈子也值了，因为他们活出了自己的精彩。

我现在面对网络销售这个东西，没有尝试过就退缩，就回到自己以前的老路，这是不是也属于固步自封，是不是因为我内在里就缺乏闯荡的勇气呢？

我低下头，试图整理自己很有些混乱的脑袋瓜子。深吸一口气，我拿起分析的武器，我要问问自己：如果加入它，我能得到什么，又将失去什么？如果不加入它，我将得到什么，又将失去什么？

首先考虑加入，能得到的有：一百八十万（如果它是传销的话，就得不到，而它是传销的可能性很大，所以这个“一百八十万”要存一个大大的问号）；一段经历（主要是能体验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一种看似勇敢无畏的豪情。

我将失去的是：失去面对朋友时坦荡的眼神；失去独立思考、学习的空间；失去我以前设定的道路；失去两年的时间；失去对人生信仰的继续探寻。

然后考虑不加入，能得到的基本是我以前所拥有的，关键是看会失去什么：失去一次全面体验新的生活方式的机会；失去一个可能的两百八十万。

如此粗粗合计了一下，我发现，将两者的得到和失去加减乘除一番，我加入网络销售所能得到的，基本上都是我不怎么重视的。而刘某那个要求“勇于突破自我”的豪言，其意义也逐渐浮现：不过是一种用词比较激昂的激将法罢了。

在当时我还有一个感触，就是对刘某的话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怀疑。这要追究到我去湖南之前，刚好读了以赛亚•伯林的《自由及其背叛》一书。看了这本书的收获之一，就是对所有要求别人实现积极自由的话语，都抱以一种足够的警惕。

从混乱中我慢慢清醒过来，理清了这些，心里也就有些底了。但是怎么去反驳她呢？

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蒙混过去的，我现在已经理不清楚了，也许当时根本就没有驳倒他们，只是咬紧牙关不松口。

在敲打这篇文字的时候，我不禁想到：如果他们所允诺的是可以做到的，也就是最起码能得到那一百八十万，对于我选择离开这件事，应该怎么评判呢？

也许，我自己揣测，我依旧不会后悔，依然认为我的选择是正确的。也许这是某种顽固，但我坚持这种顽固。我之所以是我，而不是其它任何人，不在于我与他人长相的差异，不在于经历、家庭、环境的差异，在于我有我自己的价值系统，有我自己判断事物的标准，有我自己的意义感。如果做一件事情不能给自己带来意义感，不能让自己得到内心的满足，不能让自己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理由的，那么，这件事即使能给我带来巨大的现实层面的好处，又能怎么样呢？

在这方面，我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所作所为，去留抉择，但求心之所安，但凭心之所愿。

至此，传销组织对我的洗脑基本结束，我这些关于洗脑的文字，也总算敲打完毕。要说的话在前面的文章中都已说完，这篇文章到这儿也已经太长，不罗嗦了，打住。

（文章来自一五一十部落）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普里莫·莱维：无法“审判”的灰色地带



普里莫·莱维，意大利作家、化学家以及奥斯维辛 174517 号囚犯

> **“在集中营内外，都存在一些灰色的、立场模糊的人，准备出卖人格和道德。而集中营内的极度压力倾向于提高他们的地位；他们既是犯罪的主体（随着他们选择的自由度的提高，他们的罪行也迅速增长），也是体制犯罪的载体和工具。”**

不可否认，在集中营内外，都存在一些灰色的、立场模糊的人，准备出卖人格和道德。而集中营内的极度压力倾向于提高他们的地位；他们既是犯罪的主体（随着他们选择的自由度的提高，他们的罪行也迅速增长），也是体制犯罪的载体和工具。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压迫者，在他们犯罪的同时，或者（更多的时候）犯罪之后，会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是错误的，可能体验到怀疑和不安，甚至受到惩罚。但这种痛苦不足以让他们归于受害者的行列。出于同样的原因，囚犯们的错误和缺点不足以把他们等同于他们的看管们。集中营里的囚犯成千上万，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也几乎来自欧洲的每个国家，代表着人类的一种平均的、未经选择的抽样。即使不考虑他们骤然坠入的这个地狱般的环境，人们也没有道理要求他们（正像那些虚华辞藻所维护的）达到圣徒或禁欲哲人般的行为标准。事实上，在大多数时候，他们的行为都是预先规定的。在几周或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被剥夺到只能单纯地生存下去，在一个毫无选择（尤其是道德选择）的环境中，每天在饥饿、寒冷、疲劳和殴打中挣扎。在这些人里，很少有人能在这样的考验中幸存下来。而他们的幸存，只是靠着一系列小概率事件的组合。总之，他们是靠着运气活了下来。除了刚开始时他们的健康条件可能都很好，试图在他们的命运中寻找一些共同点的做法并没有什么意义。

奥斯维辛和其他灭绝营的特遣队（Ｓｏｎｄｅｒｋｏｍｍａｎｄｏ）代表了合作者的一个极端案例。对于他们来说，人们难以提到“特权”———他们的特权仅限于（但多么巨大的代价！）在几个月内能够吃饱。这肯定不会招致其他囚犯的嫉妒。这个非常含糊的字眼，“特遣队”，党卫军指的是那些值得信赖，去操作焚尸炉的囚犯们。他们的任务是在新到的、要被送进毒气室的囚犯（往往完全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中维持秩



序；从毒气室运出尸体；拔掉尸体的金牙，剃掉女犯的头发，整理和归类衣服、鞋子和行李箱里的东西；把尸体送进焚尸炉，并监视炉体的运转，提取和清理骨灰。奥斯维辛的特遣队，视时间不同，人数从 700 人到 1000 人不等。

特遣队并不能逃脱其他每个人的命运。恰恰相反，党卫军千方百计使任何特遣队员都无法存活并说出真相。在奥斯维辛，前后共有 12 个特遣队，每个特遣队在几个月内维持有效运作，然后即被屠杀。每次德军都采用不同的诡计来避免他们进行可能的抵抗。每个特遣队的第一个任务便是焚烧他们前任的尸体。在 1944 年 10 月，最后一个特遣队进行了暴动，炸毁了其中一个焚尸炉，随后在一场完全不对等的战斗中被镇压（我稍后会介绍这场战斗）。所以，特遣队的幸存者极少，只有个别人因为命运一时不可预见的异想天开才侥幸存活。在解放后，他们中没有人愿意述说他们可怕的生活境遇。我们关于特遣队的信息，来自于幸存者贫乏的证词；来自于他们的“教唆者”在各个法庭上的供述；来自于偶然接触过特遣队的德国或波兰“平民”的证词，还有最后的，某些特遣队员，为了未来的记忆而狂热书写的日记。这日记被极端小心地埋藏在奥斯维辛焚尸炉附近。所有这些信息相互一致，但我们仍然发现难以在我们面前展开一幅完整的画卷，去了解他们每天如何生活，如何看待自己，如何接受他们的生活境遇。

最开始时，党卫军从已进入集中营的囚犯中挑选特遣队员。人们已经证明，党卫军在挑选时不仅看重囚犯的体力，也根据对面容的深刻研究。在极少数情况下，这种选拔被当作一种惩罚措施。后来，党卫军更喜欢在铁路站台上，直接从每班到达的囚犯中挑选候选人———那些新来的囚犯在运输过程中已经筋疲力尽，失去抵抗能力，在踏出火车的关键一刻，每个人都真正感到站在神秘、可怕而黑暗的门槛前，他们绝望，迷失了方向。党卫军的“心理医生”发现，在他们中抽调人选要容易得多。

特遣队基本是由犹太人组成。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并不奇怪，因为集中营的主要目标就是灭绝犹太人，而且，从 1943 年起，奥斯维辛人员的 90%—95%都是犹太人。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巨大的背叛和仇恨让人震惊——必须让犹太人把犹太人放进焚尸炉；必须表明犹太人是劣等民族，低等民族，对于任何命运和羞辱都逆来顺受，哪怕是灭绝他们自己。在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并非所有的党卫军都乐于把大屠杀当作每天的工作；他们把一部分工作（事实上，最肮脏的工作）委派给受害人来完成，从而宽慰（而且很可能的确有效）某些人的破碎的良心。

显然，把这样的逆来顺受都归咎于特定的犹太民族特征是不公正的——特遣队的成员中也包括非犹太人，德国和波兰囚犯，尽管他们常常担任着“更体面”的“卡波”职务。还有苏联战俘，纳粹认为他们只不过比犹太人稍微高级一点。他们的人数很少，因为苏联人在



奥斯维辛的人数并不多（大多数战俘在到达集中营之前就被屠杀了，被俘之后立刻被机枪杀害在巨大的万人坑边）：但他们的行为与犹太人并没什么区别。

因为特遣队的成员们了解大屠杀的可怕秘密，纳粹把他们与其他囚犯和外部世界严格地隔离开来。然而，正像任何有过类似经历的人所了解的，没有不透风的墙——信息，可能是不完整或扭曲的，有着巨大的渗透力量，而其中的一些总能渗透过严密的壁垒。我们关在集中营的时候，这些关于特遣队的含糊不清、支离破碎的传言就已经在我们中流传，后来被上面提到的渠道所证实。这种人类境遇所固有的可怕本质决定了所有相关的证词证言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保留，以至于即使在今天也难以构成一幅完整的全景，去了解这些特遣队员被迫连续数月从事这种工作"意味着什么"。人们已经证实，党卫军提供大量酒类供这些不幸的队员随意取用。而且，他们永远处于一种完全道德崩溃和筋疲力尽的状态。他们中，有人说："做这种工作，人们要么第一天就疯了，要么就慢慢习以为常。"而另一个人说："当然，我原本可能会自杀，或者被党卫军杀掉，但我想活下去，为我自己报仇，也为了作证。不要把我们当作怪物。我们和你们一样，只是更不开心得多。"

显然，不能从字面来理解他们的言语，包括我们所知道的，以及我们已经无法获知的无数言语。但对于这些身处极端绝境的人们来说，我们不能期望他们的话可以具备法律证言般的意义，但这些话语立刻成为一种悲叹、一种诅咒、一份救赎，试图为自己辩护和开脱：与其说是对可怕现实的控述，不如说是感情的释放。

筹备和组织这些特遣队是纳粹最恶毒的罪行。除了那些务实的考虑（节省人力，通过他人之手来完成最残忍的任务），还有一些更微妙的动机。这项制度代表着纳粹试图让他人（尤其是受害者）来承担犯罪的责任，甚至借此剥夺他们无辜的慰藉感。重新挖开邪恶罪行的深渊，是一件既不容易也不惬意的事情。但我认为，这件事必须得完成，因为昨天犯下的罪行，有可能在明天重演，再一次施加到我们或我们的子孙身上。对于几十年前的残酷暴行，人们往往倾向于做个鬼脸便转身离去，关闭自己的心扉：这是人们必须抵制的一种倾向。事实上，特遣队的存在有着一种含意，一个信息："我们，优等民族，是你们的毁灭者，但你们并不比我们更好；如果我们愿意，如果我们真的愿意，我们不仅可以毁灭你们的身体，也可以毁灭你们的灵魂，正像我们毁灭自己的灵魂一样。"

一名匈牙利医生，米克罗斯·尼兹利（Ｍｉｋｌｏｓ　Ｎｙｉｓｚｌｉ），是奥斯维辛最后一批特遣队中极少数幸存者中的一员。他是一位著名的解剖病理学家，验尸专家，比尔克瑙集中营党卫军的主任医师，接受门格勒（Ｍｅｎｇｅｌｅ）的领导。门格勒（在几年前去世，逃脱了正义的审判）给予他特殊对待，几乎把他视为一位同事。尼兹利所接受的任务是专门研究双胞胎——事实上，比尔克瑙正是世界上唯一有可能研究被同时杀死的双



胞胎的地方。应该顺便说一句，对于他的任务，尼兹利似乎也没有格外反对。尼兹利还是特遣队的现场医生，因此与特遣队员有密切接触。而他回忆起一件在我看来相当重要的事情。

正如我所说的，党卫军从集中营或新到的囚犯中仔细挑选特遣队员的候选人，而且毫不犹豫地当场消灭任何拒绝或看起来不适合其职责的囚犯。党卫军对待新囚犯，正像他们在所有囚犯（特别是犹太人）面前一贯的表现——蔑视和冷漠。他们早已被灌输的理念：这些人是卑鄙的生物，德国的敌人，因此并不配拥有生命，最好应该强迫他们劳动，直至劳累而死。

但他们并不这样对待特遣队的新队员——在一定程度上，党卫军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同类，现在，和他们一样是非人的禽畜，在强加的同谋中，依靠罪行的纽带，绑在同一条船上。因此，尼兹利讲述了在工作间隙，他参加了党卫军和特遣队之间的一场足球赛，一队球员代表守卫焚尸炉的党卫军，而另一队球员代表特遣队。其他党卫军士兵和特遣队员观看着这场比赛，支持着自己的球队，打赌，鼓掌，为球员加油，似乎这场比赛不是发生在地狱的大门口，而是平常的庄院中。

对于其他囚犯，这种事情从未发生过，甚至连想都不敢想。但对于他们，对于这些“焚尸炉乌鸦”，党卫军却能与他们在球场上平起平坐，或者说，几乎如此。在这个“停战协定”的背后，人们能听到魔鬼的笑声——这需要付出代价，我们成功了，你们不再是异族，对立种族，“千年帝国”的宿敌；不再是拒绝崇拜偶像的人们。我们降服了你们，腐蚀了你们，把你们拉到底层，同我们在一起。你们同我们一样，你们这些骄傲的人民——身上沾满了自己同胞的鲜血，就像我们，就像该隐，杀害了他的兄弟。来吧，我们可以一起玩。

尼兹利还讲述了另一件值得深思的往事。一批刚刚到达集中营的囚犯被杀害了，毒气室里堆满了尸体。特遣队正完成他们可怕的日常工作，整理纠缠在一起的尸体，用水龙冲洗它们，再把它们送到焚尸炉中。但他们在地板上发现了一个仍然活着的年轻姑娘。这是个意外，绝无仅有；可能人们的尸体在她周围形成了一圈壁垒，为她隔离出一些可以呼吸的空气。人们都不知所措。死亡是他们每时每刻的工作，死亡是他们的习惯，因为，准确地说，“做这种工作，人们要么第一天就疯了，要么就慢慢习以为常”。但这个姑娘还活着。他们把她藏起来，让她暖和起来，带给她牛肉汤，询问她的经历：这个姑娘只有 16 岁，她迷失了时间和空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她经历了闷罐车厢的押运，残酷的初选，被剥光衣服，再走进从未有人生还的毒气室，但她并不能理解这些经历。尽管她不能理解，但她见证了一切，所以她必须死。特遣队员们清楚这一点，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也必



然因为同样的原因而被杀害。但这些在酒精和每天的屠杀中堕落的奴隶们已经被改变，他们的面前，不再是不知姓名的乌合之众，不再是一群惊弓之鸟，不再是从闷罐车厢中走出的被吓呆的人群——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人们会不会情不自禁地联想起曼佐尼的小说《约婚夫妇》（Ｔｈｅ　Ｂｅｔｒｏｔｈｅｄ）9 中，当孩子塞西莉亚（Ｃｅｃｉｌｉａ）死于瘟疫，而她的母亲拒绝把遗体扔上堆满尸体的大车时，“恶臭的莫纳托”（ｆｏｕｌＭｏｎａｔｔｏ）的犹豫和“出奇的尊敬”呢？像这样的事情让我们震惊，是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人应该与自身相和谐、一致而统一。但我们并不应该为此而惊讶，因为人并非如此。尽管违背了所有的逻辑性，但怜悯和残酷能在同一个时刻共存于同一个人。而且，怜悯本身也不具备逻辑性。我们所感到的同情和与之对应的痛苦并没有比例关系——安妮·弗兰克（ＡｎｎｅＦｒａｎｋ）一个人所引发的同情要远多于无数遭遇了同样痛苦的人，只不过后者的形象湮灭在历史的阴影中。也许这是世间的必然。如果我们不得不体验并能体验到每个人的痛苦，那么我们将无法生存。可能，只有圣人才配拥有这种悲悯众生的可怕天赋；而对于运尸人，对于特遣队的成员们，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最好还是把我们零星的同情放在个人、邻居和伙伴身上——那些站在我们面前有血有肉的人，那些在我们天生有限的感官范围内的人。

特遣队员们叫来了医生。他为姑娘打了一针，使她恢复活力。没错，毒气并没有发挥作用，她会活下去，可她能去哪？又怎么活下去呢？就在这时，焚尸场的一名党卫军军官穆斯菲尔德（Ｍｕｓｈｆｅｌｄ）来了。

医生把他叫到一边，告诉他发生的事情。穆斯菲尔德犹豫了一会，然后做出决定——不，这个姑娘必须死。要是她的年纪再大一些，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她会更聪明些，也许可以相信她能对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保持缄默。但她只有 16 岁，不能被信任。然而，他并没有亲手杀死她。他叫来一名下属，命令他通过脑后的一记重击杀死了她。然而，穆斯菲尔德并不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除了每天例行的屠杀他还独断专行、变化无常，尤其热衷于发明和“改良”各种酷刑。他在 1947 年受到审判，被判处死刑，在克拉科夫（Ｋｒａｋｏｗ）被绞死。这很好，但即使他也不能算作铁板一块。如果生活在其他环境和年代，他的行为可能和普通人一样。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格鲁申卡（Ｇｒｕｓｈｅｎｋａ）讲述一个小洋葱的寓言故事。一个恶毒的老女人死了，坠入地狱。但她的守护天使检查她的记忆，发现她曾经有一次，仅有一次，把她从花园中挖出来的一个小洋葱施舍给了一名乞丐。于是他取出那个小洋葱，递给她。那个老女人抓住小洋葱，飞出了地狱的火焰。这个寓言总是让我反感：什么样的衣冠禽兽会在一生中不曾送出一个小洋葱这样的礼物？即使不送给其他人，也会给



他的孩子，他的妻子，他的狗？一份稍纵即逝的同情当然不能赦免穆斯菲尔德的罪行。但是，它足以让他置身于灰色地带——建筑于恐怖和顺从上的政体所滋生的模糊区域——尽管极为靠近它的边缘。

审判穆斯菲尔德并不困难，我不相信特别法庭在判决他的罪行时有任何的迟疑。在另一方面，当我们面对特遣队员时，我们审判的能力和需要就变得畏步不前。我们马上会发现问题，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人们急切地寻找答案，以便能够对人性重拾信心：他们为什么接受这份工作？他们为什么不反抗？他们为什么不情愿去死？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所掌握的事实允许我们尝试回答这些问题。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了这份工作；一些人反抗了，明知他们会死。至少有一件事，我们是确定无疑的：来自科孚（Ｃｏｒｆｕ）14 的 400 名犹太人，在 1944 年 7 月被招募进入特遣队，但他们无一例外地拒绝接受这份工作，立刻被纳粹送进了毒气室。我们已经发现各种各样的个人反抗事例，都立刻被纳粹残暴地处死。特遣队极少数幸存者之一，菲利普·穆勒（ＦｉｌｉｐＭüｌｌｅｒ）告诉我们，他的一个同伴被党卫军活活地推进焚尸炉烧死。我们还发现了许多自杀事件，一些发生在被招募的时候，而另一些则发生在被招募之后。最后，我们不能忘记，在 1944 年 10 月，特遣队在奥斯维辛的历史上尝试了唯一一次绝望的反抗。

我们得到的关于这次反抗的信息并不完整，同时充满矛盾。我们得知，起义者（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五座焚尸炉其中两座的操作人员）极为缺少武器装备，也未与波兰游击队或集中营内的地下抵抗组织联系。他们炸毁了三号焚尸炉并与党卫军展开战斗。那场战斗很快就结束了，很多起义者设法割开铁丝网，逃出集中营，但很快被纳粹捉住。他们没有人活下来。党卫军立刻处决了大约 450 人。而在党卫军中，有 3 人阵亡，12 人受伤。

因此，我们所了解的焚尸场上那些可悲的苦力们，是那些从一次筛选到另一次，情愿多活几个星期而不是立刻死去的人，那些无论如何都不会诱惑自己，或者被诱惑，亲手去屠杀的人。我重申：我相信没有人有权力去审判他们——经历过集中营生活的人们没有权力，而没有经历过的人更没有权力。我愿意邀请任何敢于亲身做出判断的人，诚心诚意地，进行一个概念化的实验：让他想象（如果他可以），长年累月生活在一个犹太人隔离区，遭受着慢性饥饿、疲劳、混乱和羞辱的折磨；他已经见证到身边的死亡，他所爱的人，一个接一个死去；他与世界隔离，无法接收或发出信息；终于有一天，他被塞进火车，80 到 100 人挤在一个闷罐车厢里；在无眠的日日夜夜，他被押送到未知的目的地；而最终，他被投进高墙中的一个无法理解的人间地狱。对于我来说，这真是“Ｂｅｆｅｈｌｎｏｔｓｔａｎｄ”（德语：“被迫服从命令”），并不是纳粹们在受审时有计划地、厚颜无耻地引用的借口（后来也被许多其他国家的战犯所引用）。前者是刻板的，要么服从，要么马



上被杀；而后者则是权力中心的一种内部现实，可以通过某些手段得以缓解（实际上，往往得到缓解），职务晋升的推迟，温和的惩罚，即使最坏的情况，也不过是把反对者调往前线。

我所建议的实验并不让人愉快。韦科尔在他的小说《黑夜的武器》中尝试描写了这种情景，他称之为“灵魂之死”。即使在今天重读这本小说，我仍无法忍受其中唯美主义的文学辞藻。然而，确定无疑，它所直面的正是灵魂的死亡。现在没有人知道自己的灵魂能在这样的考验中坚持多长时间而不会屈服或崩溃。每个人都拥有不为自己所知的潜力之源，但只有通过极端不幸的考验，我们才会了解自己的潜力是大是小，或是根本不存在。即使不考虑特遣队这个极端的例子，我们这些幸存者，在讲述我们命运的沉浮变迁时，往往会听到这样的回答，“如果我是你，我连一天也活不了。”这句话并不存在准确的意义——一个人永远无法变成另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如此复杂，试图预测人们的行为是毫无意义的，尤其在如此极端的环境中。人们也无法预知自己的行为。所以，我要求我们以同情而严谨的态度思考“焚尸炉乌鸦”的故事，但要暂缓对他们做出的判决。

面对查伊姆·兰科斯基（ＣｈａｉｍＲｕｍｋｏｗｓｋｉ）的故事时，我们会因同样的“无法判决”（ｉｍｐｏｔｅｎｔｉａ　ｊｕｄｉｃａｎｄｉ）而束手无策。准确地说，查伊姆·兰科斯基的故事并不是一个集中营的故事，尽管它的结尾归于集中营。它是一个犹太人隔离区的故事。虽然我已经在其他地方讲过这个故事，但它有力地证明了“压迫必然引起人类道德模糊性”这个基本主题，所以我必须承认它非常适合我们的讨论。从奥斯维辛回到家中的时候，我在衣袋里发现了一枚由轻合金制成的奇特硬币。我为了这一天而一直保留着它。它的表面布满了划痕和蚀缺，在它的一面上，有一个希伯来星（大卫之盾），1943 年的日期，以及“ｇｅｔｔｏ”（隔离区）的铭文。在它的另一面上，铭刻着：“ＱＵＩＴＴＵＮＧ ＢＥＲ１０ＭＡＲＫ”和“ＬＴＥＳＴＥＤＥＲＪＵＤＥＮＩＮＬＩＴＺ ＭＡＮＮＳＴＡＤＴ”，分别意为“收讫 10 马克”和“利茨曼恩市犹太元老会”。总之，这是一个在犹太人隔离区内使用的硬币。多年以来，我忘记了它的存在。后来，大约在 1974 年，我才能再次组织起这个迷人而邪恶的故事。

为了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击败俄国人的利茨曼恩将军，纳粹将罗兹（Ｌｏｄｚ）改名为“利茨曼恩市”（Ｌｉｔｚｍａｎｎｓｔａｄｔ）。在 1944 年的最后一个月里，罗兹犹太人隔离区内的最后一批幸存者被押运至奥斯维辛，而我很可能在集中营的地上发现了这枚已经毫无用处的硬币。

在 1939 年，罗兹拥有 75 万居民，是波兰最工业化的城市，也是最“现代化”和最丑陋的城市。这座城市以纺织业为主，就像曼彻斯特和比耶拉（Ｂｉｅｌｌａ），城市中分布着



无数大大小小的工厂。即使在那时，大部分工厂也已经废弃。鉴于罗兹在东欧占领区的各个城市中占有重要地位，纳粹迫不及待地建立了罗兹犹太人隔离区，并恢复了中世纪反宗教改革时期的犹太人聚居区政府，并以他们现代化的残酷使其愈加恶毒。罗兹犹太人隔离区，早在 1940 年 2 月便已成立，在时间上是第一个犹太人隔离区，而在人数上，仅次于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它有超过 16 万犹太人，一直到 1944 年秋天才被废弃。所以它是存在时间最长的纳粹犹太人隔离区，这必然归功于两个原因：它的经济重要性和隔离区主席复杂的人格。

他的名字叫查伊姆·兰科斯基。一个失败的小实业家，经历了多次旅行和坎坷命运之后，1917 年在罗兹定居。在 1940 年时，他差不多已经 60 岁了，是一个没有子女的鳏夫。他受到特别的尊敬，作为犹太慈善机构的董事，也被公认为是一个精力充沛、粗鲁专横的人。隔离区主席（或元老）的职位本身是可怕的，但它是一种社会地位，在等级制度中迈上一个台阶，还有权力和特权，也就是说，职权——而兰科斯基酷爱职权。人们并不知道他是如何得到这个职务的。

也许，这只是纳粹邪恶风格的恶作剧（兰科斯基是，或者看起来是，一个带着一定声望的小丑——总之，理想的傻瓜）；也许他靠钻营巴结而被选中，他对权力的渴望一定十分强烈。他为期四年的主席任期，或者更准确地说，他的独裁，是由权力狂的黄粱美梦、原始的生命力、真正的外交和组织才能组成的令人触目惊心的结合体。他很快将自己看作一个至高无上而开明的君主，而他必然被鼓励追寻他的德国主子的道路。但他的德国主子们，却实实在在地玩弄他，尽管欣赏他作为一个优秀管理者和领导者的才能。他们授予他发行货币的权力——以金属材质（像我的硬币）和官方供应的水印纸张印刷两种形式。这些货币用于支付隔离区内那些精疲力竭的工人们的工资，让他们可以用这些钱在隔离区商店里购买他们的食物配额。

这些工人的平均食物配额大约是每天 800 卡路里，而即使在完全休息的条件下，一个人每天的生存也至少需要 2000 卡路里的热量。从他的这些饥肠辘辘的民众身上，兰科斯基不仅热衷于获得顺从和尊敬，还有爱戴——正是在这方面，现代的独裁区别于古代的独裁。只要他稍稍表示可以换得一条面包的四分之一，便组建了一支由杰出艺术家和手工艺者组成的大军。他命令设计并印刷以他的肖像为内容的邮票，表现出他雪白的须发，配以希望和信仰的光环。他常常乘着一辆由瘦骨嶙峋的老马拉着的四轮马车穿过他的微型王国的街道，车两旁挤满了乞丐和神职申请人。他有一件堂皇的披风，并让自己围绕在一群谄谀之辈和心腹亲信之中。他让他的宫廷诗人谱写颂歌，歌颂“他那坚定而有力的双手”，以及他在隔离区的领导带来的和平和秩序。他要求邪恶学校里的孩子们写歌颂“我们敬爱和天佑的主席”的作文，尽管这些孩子每天都受到瘟疫、营养不良和德国人的袭击摧残。就像



所有的独裁者，他迫不及待地建立了一支有效的警察力量，表面上是为了维持秩序，实际上是为了保护他自己的人身安全，并强行贯彻他制定的方针政策——600 名手持棍棒的警卫，还有数目不明的暗探。他进行过许多演讲，我们仍旧保留着其中的一些片断。而他的演讲风格确定无疑——采取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演讲技术，煽动性的口号，与群众虚伪的对话，靠镇压和喝彩来营造人们的承认。他的这种模仿可能是故意为之，也可能是对当时主宰欧洲的“必然英雄”——正如邓南遮（D’Ａｎｎｕｎｚｉｏ）所歌颂的——对这些“榜样”的下意识的认同。然而，更可能的是，他的态度来自于他的环境和地位——一个小小的独裁者，在那些高高在上的主子们眼里，他只是个任人宰割的小人物；但对于地位更低的民众来说，他却是无所不能的、拥有宝座和权杖的君主，不用担心有人驳斥或耻笑他的演讲。

但他的形象要比目前所呈现的更为复杂。兰科斯基不仅是一个叛徒和同谋者，在一定程度上，除了让其他人信服外，他应该也曾逐步说服自己：他就是弥赛亚，他的人民的救星。至少有时，他必定也曾希望为他的人民谋求幸福。欲求善名，必先善事，哪怕对于一个腐朽的总督来说，感到自己的善也能让他感到心满意足。矛盾的是，他既认同压迫者，又同情被压迫者。因为，正如托马斯·曼所说，人是一种混合生物。我们还要补充一点，他越受到压力的影响，就会变得越复杂——在这点上，他逃脱了我们的审判，就像指南针在磁极上会乱转一样。

尽管他不断受到德国人的嘲笑和蔑视，但兰科斯基很可能还是把自己当作一个主子，而不是奴才。他必须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权威：当盖世太保在毫无警告的情况下抓走他的议员时，他勇敢地保护他们，不惜让自己遭受德国人的嘲讽和侮辱——他知道如何体面地忍受这样的待遇。在另一些时候，当德国人不断从罗兹压榨出越来越多的布料，并从他的手里带走越来越多没有价值的人口（孩子、老人和病人，送去特雷布林卡，后来改为奥斯维辛）时，他尝试和德国人讨价还价。而对于他的子民，他则急于通过极端严酷的镇压，来消灭反抗的苗头（就像其他犹太人隔离区一样，在罗兹隔离区里存在着政治抵抗的英勇的核心力量，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者、亲纳粹派或共产党人），但他的动机并非出于对德国人的奴颜婢膝，而是将这些反抗者视为叛逆，由于“皇室人员”所遭受的暴力反抗而发泄怒气。

1944 年 9 月，随着苏联前线的日渐逼近，纳粹开始清除罗兹犹太人隔离区。成千上万的男人和女人被押送到奥斯维辛，德国世界的排泄系统。因为他们的劳动力早已被榨光，所以几乎立刻被全部屠杀了。大约有 1000 人留在隔离区内，负责拆除工厂设施并掩盖大屠杀的痕迹。他们很快被苏联红军解放。多亏他们才让我们拥有了记录在本书中的这些信息。

查伊姆·兰科斯基的最终下场有两种说法，似乎他在世时所具备的道德模糊性也延伸到了他的死亡。根据第一种说法，在纳粹清除罗兹犹太人隔离区的过程中，他试图阻止将他的兄弟送进集中营，因为他不想与兄弟分离。据说，一个德国军官建议他应该和他的兄弟一起自愿离开，而他则接受了这个建议。另一种说法则相反，汉斯·比博（ＨａｎｓＢｉｅｂｏｗ），另一个表里不一的人物，曾尝试营救兰科斯基。这个声誉不佳的德国实业家是负责犹太人隔离区管理委员会的公务员，同时也是隔离区唯一的承包商。因此，他的地位非常微妙，因为罗兹的纺织工厂是为军方服务的。比博不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家伙。对他而言，只因为是犹太人便要施加惩罚和痛苦，这样的事情毫无意义，他也没有兴趣。他的兴趣在于通过他的合同赚钱，而这些合同是否合法则无关紧要。隔离区内的折磨触动了他，但仅仅是间接的。他想让这些奴工去工作，所以他不想他们因饥饿而死——但他的道德到此为止。事实上，他是隔离区真正的主人，而他和兰科斯基之间是一种买卖关系，这往往也会变成一种不成熟的友谊。比博，这只玩世不恭的小走狗不会认真对待种族魔鬼学，他只希望永远取消拆除隔离区的计划，因为隔离区对他来说是一项好生意，而他还要依赖兰科斯基的同谋关系，所以需要避免他被投入集中营。在此，人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现实主义者往往要比一个理论家客观得多。但党卫军的理论家们可不这么看，他们更强大。他们是彻底的激进主义者——摆脱隔离区，也要摆脱兰科斯基。

无计可施的比博通过他优秀的关系网，给兰科斯基要去的集中营写了一封信，他把信交给兰科斯基，并保证这封信能保护他，确保他受到特殊对待。据说，兰科斯基向比博要求，在去奥斯维辛的路上，他和他的家人应享有符合其身份的庄重待遇，并获得了批准。也就是说，一节特别车厢，挂在一列押运毫无特权的囚犯的货运列车的车尾。然而，德国人手中的犹太人只有一种命运，无论他们是懦夫或英雄，谦逊或骄傲。无论是那封信，还是特殊车厢，都无法拯救查伊姆·兰科斯基——犹太人的国王——走进毒气室。

像这样的故事并不只是一个故事。它蕴含着重大的含义，它提出的问题要远多于回答的问题，它本身总结了灰色地带的整个主题，并让人想要追问。它呐喊着需要被理解，因为在这个故事中，人们观察到了一种象征，就像在梦中看到天堂。

兰科斯基是什么样的人？他既不是残酷无情的恶魔，也不是一个普通人，而我们周围有许多人正像他一样。在他的“职业生涯”之前所屡屡遭受的失败，对他的影响是重大的——很少有人能够从失败中汲取道德的力量。在我看来，从他的故事中，人们会发现，在典型情况下，政治压迫几乎必将催生一个难以界定的区域——一个道德模糊、人格扭曲的区域。在每个至高无上的宝座脚下，都会群集着像兰科斯基这样的人，争夺着自己的那部分小小的权力。这种愚蠢的景象时常重演——我们会记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岁月里，在希特勒的宫廷，在墨索里尼的萨罗共和国的内阁中，所存在的垂死挣扎。他们都是灰色



的人，首先是出于盲目，然后变成罪犯，在他们中疯狂地分割着邪恶而垂死的职权。权力就像毒品：没有涉足其中的人不会意识到对它的需要，而一旦开始，也许是一种偶然（就像兰科斯基），对权力的依赖和需要自诞生一刻起便日渐膨胀，正如对现实的否定和全能的幼稚梦想。如果对兰科斯基醉心权力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这种陶醉并非仅存在于隔离区的环境中。换句话说，对权力的痴迷是如此的强大，甚至蔓延到原本为了消灭所有个人权欲而设计的环境中。事实上，对于他，以及他的那些更著名的榜样，由于持久而无可置疑的权力所引起的“症状”是显而易见的：扭曲的世界观、教条式的傲慢、对谄媚的需要、痉挛般地运用命令杠杆，以及对法律的蔑视。

所有这些都无法免除兰科斯基的责任。在罗兹的苦难中，一个兰科斯基应运而生，这是让人痛苦和苦恼的。如果他在自己的悲剧中得以幸存，而他毒害隔离区的悲剧，并将自己的历史形象叠加于其上，没有任何特殊法庭会赦免他的罪行，我们当然也不会在道德的层面上赦免他。但是，的确存在情有可原的环境因素——像纳粹这样的恶魔主义具有可怕的腐蚀力量，让人们难以在它面前独善其身。它降低受害者的人格，同化他们，因为它需要大大小小的同谋者。必须具备真正坚强的道德盔甲，才能抗拒它的腐蚀。而对于一个罗兹商人，查伊姆·兰科斯基，以及当时的整整一代人，所具备的道德盔甲是脆弱的。然而，我们的道德又有多坚强？今天的欧洲人的道德又有多坚强呢？如果受到必然性的驱使，同时又面临巨大的诱惑，我们每个人又会怎么做呢？

兰科斯基的故事是一个令人悲伤、不安的故事。同样，还有“卡波”们的故事；集中营的小职员们的故事；那些服务于某个政体，却有意漠视其罪行的小小掌权者们；那些批准所有事情，因为一个签字并不值多少钱的下级官员们；那些大摇其头却默许罪行发生的人们；还有那些说“就算我不去做，其他人也会做得比我更坏”的人们的故事。

兰科斯基，一个简明而典型的形象，必然被置于这个道德模糊的灰色地带。我们难以判断他的良心程度——只有他站在我们面前才能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哪怕是说谎，就像他可能一直在说谎，也在欺骗他自己。但无论如何，他能帮助我们理解他，就像每个被告人帮助他的法官，即使他并不想，即使他在说谎，因为人们扮演一个角色的能力并非是无限的。

但是所有这些并不足以解释这个故事所散发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也许它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我们看到兰科斯基，便如在镜中看到了自己，他的道德模糊性同我们一样，这是我们的第二天性——我们正是由粘土和灵魂混杂而成。他的狂热正同我们一样，我们对“在锣鼓中坠入地狱”的西方文明的狂热，更可悲地点缀着我们社会权势扭曲的象征形象。他的愚蠢在于他的自以为是，正像《一报还一报》（Ｍｅａｓｕｒｅ ｆｏｒＭｅａｓｕｒｅ）



中依莎贝拉所描述的世人：骄傲的世人掌握到暂时的权力，却会忘记了自己琉璃易碎的本来面目，像一头盛怒的猴子一样，装扮出种种丑恶的怪相，使天上的神明们因为怜悯他们的痴愚而流泪；就像兰科斯基，权力和权势让我们眼花缭乱，忘记了自己易碎的本质。有意或无意间，我们与权力达成了妥协，却忘记了我们都在隔离区内，这隔离区高墙森森，墙外便是死神的领土，而死亡的列车正静待着准备出发。

（《被淹没和被拯救的》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这是中国大陆首次译介莱维作品，《东方历史评论》受权转载部分篇章，本文来自本书第二章《灰色地带》）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池莉：革命肥肉


池莉，作家

“意识一旦发生，灵魂的不安很快降临，一种冷酷的现实摆在我的面前，那就是：我和大家不一样！我不在“大家”里面！我，一个孩子，以一己的渺小和微弱，面对着大多数人的嫉妒和排斥！我惶恐了，我警醒了，我开始思想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饥饿感觉却永远同样：饿是疼！

我们这一代人，最刻骨的记忆，大约就是饥饿了。

20 世纪 60 年代初，持续三年的大饥荒，城乡处处是营养不良面黄肌瘦有气无力的人，树皮草根也被挖去果腹，饿死人的事情到处发生，饥饿成为全国人民的绝对恐惧。

而我个人对于饥饿的感受，却来得复杂得多。原因很简单：我们家族的全体成年人，出于护犊的本能，一方面省出自己口粮，一方面不惜动用几辈人积累的家底，确保他们后代能够吃饱饭。对于个别重点孩子，还保证了优质营养。我有幸成为这个重点孩子。幼小的我，以自己良好的长势和聪明秀丽，被家族挑选了出来。祖父辈以他们深厚的爱和希望，每天守候我，在我吃饭之前，哄走或者赶开别的孩子，喂我吃鸡蛋或者肉食。且他们还固执又悲壮地坚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培养和教育，大家闺秀的细嚼慢咽温文尔雅被始终贯彻执行。贪馋的饕餮相被我外公外婆毫不留情地杜绝。他们坚信饕餮相就是穷相和贱相，那会导致子孙后代的卑贱和猥琐，将世代受穷。所以……所以我不懂饥饿。

当全国人民普遍饥饿的年代，幼小的我并不饥饿。当我最初具有他者意识的时候，万分震惊地发现一个瘦弱的邻居小女孩，在婚宴的餐桌上，抢了一大片粉蒸肉，她把肥嘟嘟的肉片飞快地埋进她的饭里，夺口而吃，吃得勇猛无畏，眼睛贼亮，额头冒汗，满脸放出幸福光彩。

而我，从来还不知道肥肉有这么好吃！

意识一旦发生，灵魂的不安很快降临，一种冷酷的现实摆在我的面前，那就是：我和大家不一样！我不在“大家”里面！



我，一个孩子，以一己的渺小和微弱，面对着大多数人的嫉妒和排斥！我惶恐了，我警醒了，我开始思想了。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又恰好来临，特权阶层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猛烈批判。吃肥肉的小女孩摇身一变，成为我们小学生中最具有革命性的红小兵；而我沦为人皆不齿的黑五类子女。

我怎么可以不羞愧？饥饿的道德力量是这样的强大，肥肉与瘦肉自然前者是革命的。我开始反感自己的家族而羡慕穷孩子和他们的饥饿感。我渴望以那种饥饿感去体验吃肥肉的小女孩的快乐和幸福。我渴望成为中国人民和革命群众的一员。那年代，凡以穷人的名义，以社会公平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以瘦骨嶙峋的保尔·柯察金的名义，以在监狱里顽强绝食的刘思扬的名义，以饥饿困顿双目炯炯的牛虻的名义，都足以让我青春的热血激荡和沸腾。

终于，盼望已久的时候到来，我高中毕业了，我迫不及待地写了大红的决心书张贴出去，积极要求立刻奔赴农村，绝对不要再做无聊的温室花朵。

正是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满足了我对肥肉之香的渴望。

作为一名知青，我获得了自我革命的强大理由，可以坚决拒绝家长的汇款，坚持与广大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于是很快，饥饿就上身了。原来我自己一年到头的辛苦劳动，不足以获得报酬。除了国家规定的知青口粮之外，我再没有任何钱去购买任何食品。日复一日的超强体力劳动与正在生长的身体使得饥饿感飞快地加强加深和加重。我终于知晓了饥饿的秘密。但也正是由于饥饿，我归队了。大家接纳了我。我成为了广大知青的一员。我成为了人民。每当男知青要去偷鸡摸狗，他们会叫我烧灶膛。大家的叫唤让我如此温暖和感恩。

人生盛事是突然来临的。进了腊月，快过年了，有一天，突然听说大队要杀猪！而且要请我们几个没有提前回家坚守农村战斗岗位的知青到大队部去，和干部一起吃肉迎接革命新春并以资鼓励。

头一天的夜饭，我们就故意没有吃饱，留下空腹去迎接美好明天。

翌日早上，红日东升，我们几人就迎着朝阳早早跑到了大队部。在大队部整整一天，我亲睹了紧张的杀猪以及分配猪肉以及架起大锅烹煮猪肉的全过程。

大队部里外人山人海，民兵持枪维持秩序，干部或严肃地反剪手臂发出指示，或一手叉腰和蔼可亲。杀猪佬人手不够，除了专业屠夫还有业余杀手，是大队赤脚医生，他在血腥场面中闹出许多笑话。好家伙啊，那一番张牙舞爪，人嘶猪嚎，真是气势磅礴，蔚为壮观，让我心情激动，久久不能平静。



夜幕降临，我手里捧上了一大碗萝卜煮肉！

我用筷子夹起一片厚厚的肥肉，只见肉片微微颤动膘光四射喜气洋洋。那个吃肥肉的小女孩，唰唰地穿越时空来到我眼前，令我浑身发抖，热泪满眶。我低头咬了一口，竟然中邪一般耳鸣不已，脑子里隆隆有声，奇异的肉香五味翻涌。这一年我十八岁，我终于体验了那小女孩的香甜与幸福。那一天我发现了一个真理：肥肉真好吃！

下雪了，在乡村的土屋里猫冬。用当年的晚稻新米，蒸出水光油滑的白米饭，切一把小葱葱花，洒一抹子细盐，最后小心翼翼拧开罐头瓶子，用筷子挑一小坨白花花的猪油——这是那一天大队书记给予知青的奖赏。将这一小坨猪油插进热气腾腾的新米饭里，和着葱花与细盐，轻轻地搅拌搅拌，送一口到嘴里：刹那间，山清水秀风和日丽世界变得如此可爱！

后来，慢慢地，我还是更习惯吃瘦肉。慢慢地，连猪肉都少吃起来。慢慢地，我还是更喜欢离群索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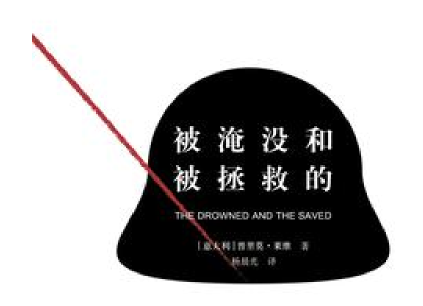
革命也不再可以随意地让我热血沸腾。唯有肥肉那浓烈的油腻的香，从此无法淡去。

因为想念，每年总有一两次，我还是要做做红烧肉的。带皮的五花肉，肥肉部分不能太少，炖得酥软颤抖，色红如醉枣，质地晶莹又剔透，含到嘴里就化，吃一口便忍不住要拍案惊奇，道：好！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荐书：《被淹没的与被拯救的》







作者：（意大利）普里莫·莱维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原作名：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

译者：杨晨光

出版年：2013-3

页数：243

ISBN：9787542639943

本书是意大利最具知识分子良心的天才作家普里莫•莱维的最后作品。莱维以生命完成了对纳粹暴行的见证，他的简明易懂的作品是对生活奇妙的赞颂，证明了人类的精神无法被战胜，以及人类通过富有意义的作品、道德和艺术击败死亡的能力。

(图书简介来自豆瓣网)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一群人的魔咒？

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节选）


王小波，作家

“那位老乡决定要说该同学一顿，期期艾艾地憋了好半天，才说出：哇！不行啦！思想啦！斗私批修啦！后来我们回家去，为该老乡的话语笑得打滚。可想而知，在今天，那老乡就会说：哇！不行啦！五讲啦！四美啦！三热爱啦！同样也会使我们笑得要死。我希望自己朴实无华，说起话来，不要这样绕嘴，这样古怪，这样让人害怕。这也是我保持沉默的原因之一。”

君特·格拉斯在《铁皮鼓》里，写了一个不肯长大的人。小奥斯卡发现周围的世界太过荒诞，就暗下决心要永远做小孩子。在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成全了他的决心，所以他就成了个侏儒。这个故事太过神奇，但很有意思。人要永远做小孩子虽办不到，但想要保持沉默是能办到的。

在我周围，像我这种性格的人特多——在公众场合什么都不说，到了私下里则妙语连珠，换言之，对信得过的人什么都说，对信不过的人什么都不说。起初我以为这是因为经历了严酷的时期（文革），后来才发现，这是中国人的通病。龙应台女士就大发感慨，问中国人为什么不说话。她在国外住了很多年，几乎变成了个心直口快的外国人。她把保持沉默看作怯懦，但这是不对的。

沉默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一种生活方式。它的价值观很简单：开口是银，沉默是金。一种文化之内，往往有一种交流信息的独特方式，甚至是特有的语言，有一些独有的信息，文化可以传播，等等。这才能叫做文化。

沉默有自己的语言。举个住楼的人都知道的例子：假设有人常把一辆自行车放在你门口的楼道上，挡了你的路，你可以开口去说：打电话给居委会；或者直接找到车主，说道：同志，五讲四美，请你注意。此后他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回答你，我就不敢保证。我估计他



最起码要说你“事儿”，假如你是女的，他还会说你“事儿妈”，不管你有多大岁数，够不够做他妈。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沉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这种行为的厌恶之情：把他车胎里的气放掉。干这件事时，当然要注意别被车主看见。

还有一种更损的方式，不值得推荐，那就是在车胎上按上个图钉。有人按了图钉再拔下来，这样车主找不到窟窿在哪儿，补带时更困难。假如车子可以搬动，把它挪到难找的地方去，让车主找不着它，也是一种选择。这方面就说这么多，因为我不想编沉默的辞典。

一种文化必有一些独有的信息，沉默也是有的。戈尔巴乔夫说过这样的话：有一件事是公开的秘密，假如你想给自己盖个小房子，就得给主管官员些贿赂，再到国家的工地上偷点建筑材料。这样的事干得说不得，属于沉默；再加上讲这些话时，戈氏是苏共总书记，所以当然语惊四座。还有一点要补充的，那就是：属于沉默的事用话讲了出来，总是这么怪怪的。

沉默也可以传播。在某些年代里，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了，沉默就像野火一样四下蔓延着。把这叫做传播，多少有点过甚其辞，但也不离大谱。在沉默的年代里，人们也在传播小道消息，这件事破坏了沉默的完整性。好在这种话语我们只在一些特定的场合说，比方说，公共厕所。最起码在追查谣言时，我们是这样交待的：这话我是在厕所里听说的！这样小道消息就成了包含着排便艰巨的呓语，不值得认真对待。另外，公厕虽然也是公共场合，但我有种强烈的欲望，要把它排除在外，因为它太脏了。我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从我懂事的年龄就常听人们说：我们这一代，生于一个神圣的时代，多么幸福，而且肩负着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圣使命等等；在甜蜜之余也有一点怀疑：这么多美事怎么都叫我赶上了。再说，含蓄是我们的家教。

在三年困难时期，有一天开饭时，每人碗里有一小片腊肉。我弟弟见了以后，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冲上阳台，朝全世界放声高呼：我们家吃大鱼大肉了！结果是被我爸爸拖回来臭揍了一顿。经过这样的教育，我一直比较深沉。所以听到别人说：我们多么幸福、多么神圣时，别人在受苦，我们没有受等等，心里老在想着：假如我们真遇上了这么多美事，不把它说出来会不会更好。当然，这不是说，我不想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对于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我是这么想的：与其大呼小叫说要去解放他们、让人家苦等，倒不如一声不吭。忽然有一天把他们解放，给他们一个意外惊喜。

总而言之，我总是从实际的方面去考虑，而且考虑得很周到。智者千虑尚且难免一失，何况当年我只是个小孩子。我就没想到这些奇妙的话语只是说给自己听的，而且不准备当真去解放谁。总而言之，家教和天性谨慎，是我变得沉默的起因。



与沉默的大多数相反，任何年代都有人在公共场合喋喋不休。我觉得他们是少数人，可能有人会不同意。如福科先生所言，话语即权力。当我的同龄人开始说话时，给我一种极恶劣的印象。有位朋友写了一本书，写的是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书名为《血统》。可以想见，她出身不好。她要我给她的书写个序。这件事使我想起来自己在那些年的所见所闻。

文革开始时，我十四岁，正上初中一年级。有一天，忽然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班上的一部份同学忽然变成了红五类，另一部份则成了黑五类。我自己的情况特殊，还说不清是哪一类。当然，这红和黑的说法并不是我们发明出来，这个变化也不是由我们发起的。照我看来，红的同学忽然得到了很大的好处，这是值得祝贺的。黑的同学忽然遇上了很大的不幸，也值得同情。我不等对他们一一表示祝贺和同情，一些红的同学就把脑袋刮光，束上了大皮带，站在校门口，问每一个想进来的人：你什么出身？他们对同班同学问得格外仔细，一听到他们报出不好的出身，就从牙缝里迸出三个字："狗崽子！"当然，我能理解他们突然变成了红五类的狂喜，但为此非要使自己的同学在大庭广众下变成狗崽子，未免也太过分。这使我以为，使用话语权是人前显贵，而且总都是为了好的目的。现在看来，我当年以为的未必对，但也未必全错。

话语有一个神圣的使命，就是想要证明说话者本身与众不同，是芸芸众生中的佼佼者。现在常听说的一种说法是：中国人拥有世界上最杰出的文化，在全世界一切人中最聪明。对此我不想唱任何一种反调，我也不想当人民公敌。我还持十几岁时的态度：假设这些都是实情，我们不妨把这些保藏在内心处不说，"闷兹蜜"。这些话讲出来是不好的，正如在文革时，你可以因自己是红五类而沾沾自喜，但不要到人前去显贵，更不要说别人是狗崽子。根除了此类话语，我们这里的话就会少很多，但也未尝不是好事。

现在我要说的是另一个题目：我上小学六年级时，暑期布置的读书作业是《南方来信》。那是一本记述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读物，其中充满了处决、拷打和虐杀。看完以后，心里充满了怪怪的想法。那时正在青春期的前沿，差一点要变成个性变态了。总而言之，假如对我的那种教育完全成功，换言之，假如那些园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对我的期望得以实现，我就想象不出现在我怎能不嗜杀成性、怎能不残忍，或者说，在我身上，怎么还会保留了一些人性。好在人不光是在书本上学习，还会在沉默中学习。这是我人性尚存的主因。

现在我就在发掘沉默，但不是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来发掘。这篇东西大体属于文学的范畴，所谓文学就是：先把文章写到好看，别的就管他妈的。现在我来说明自己为什么人性尚存。文化革命刚开始时，我住在一所大学里。有一天，我从校外回来，遇上一大伙人，正在向校门口行进。走在前面的是一伙大学生，彼此争论不休，而且嗓门很大；当然



是在用时髦话语争吵，除了毛主席的教导，还经常提到“十六条”。所谓十六条，是中央颁布的展开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规定，其中有一条叫做“要文斗、不要武斗”，制定出来就是供大家违反之用。在那些争论的人之中，有一个人居于中心地位。但他双唇紧闭，一声不吭，唇边似有血迹。在场的大学生有一半在追问他，要他开口说话，另一半则在维护他，不让他说话。

文化革命里到处都有两派之争，这是个具体的例子。至于队伍的后半部分，是一帮像我这么大的男孩子，一个个也是双唇紧闭，一声不吭，但唇边没有血迹，阴魂不散地跟在后面。有几个大学生想把他们拦住，但是不成功，你把正面拦住，他们就从侧面绕过去，但保持着一声不吭的态度。这件事相当古怪，因为我们院里的孩子相当的厉害，不但敢吵敢骂，而且动起手来，大学生还未必是个儿，那天真是令人意外的老实。我立刻投身其中，问他们出了什么事，怪的是这些孩子都不理我，继续双唇紧闭，两眼发直，显出一种坚忍的态度，继续向前行进——这情形好像他们发了一种集体性的癔症。

有关癔症，我们知道，有一种一声不吭，只顾扬尘舞蹈；另一种喋喋不休，就不大扬尘舞蹈。不管哪一种，心里想的和表现出来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在北方插队时，村里有几个妇女有癔症，其中有一位，假如你信她的说法，她其实是个死去多年的狐狸，成天和丈夫（假定此说成立，这位丈夫就是个兽奸犯）吵吵闹闹，以狐狸的名义要求吃肉。但肉割来以后，她要求把肉煮熟，并以大蒜佐餐。很显然，这不合乎狐狸的饮食习惯。所以，实际上是她，而不是它要吃肉。至于文化革命，有几分像场集体性的癔症，大家闹的和心里想的也不是一回事。但是我说的那些大学里的男孩子其实没有犯癔症。后来，我揪住了一个和我很熟的孩子，问出了这件事的始末：原来，在大学生宿舍的盥洗室里，有两个学生在洗脸时相遇，为各自不同的观点争辩起来。争着争着，就打了起来。其中一位受了伤，已被送到医院。另一位没受伤，理所当然地成了打人凶手，就是走在队伍前列的那一位。这一大伙人在理论上是前往某个机构（叫做校革委还是筹委会，我已经不记得了）讲理，实际上是在校园里做无目标的布朗运动。

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线索：被打伤的学生血肉模糊，有一只耳朵（是左耳还是右耳已经记不得，但我肯定是两者之一）的一部份不见了，在现场也没有找到。根据一种安加莎・克里斯蒂式的推理，这块耳朵不会在别的地方，只能在打人的学生嘴里，假如他还没把它吃下去的话；因为此君不但脾气暴躁，急了的时候还会咬人，而且咬了不止一次了。我急于交待这件事的要点，忽略了一些细节，比方说，受伤的学生曾经惨叫了一声，别人就闻声而来，使打人者没有机会把耳朵吐出来藏起来，等等。总之，此君现在只有两个选择，或是在大庭广众之中把耳朵吐出来，证明自己的品行恶劣，或者把它吞下去。我听到这些



话，马上就加入了尾随的行列，双唇紧闭，牙关紧咬，并且感觉到自己嘴里仿佛含了一块咸咸的东西。

现在我必须承认，我没有看到那件事的结局；因为天晚了，回家太晚会有麻烦。但我的确关心着这件事的进展，几乎失眠。这件事的结局是别人告诉我的：最后，那个咬人的学生把耳朵吐了出来，并且被人逮住了。不知你会怎么看，反正当时我觉得如释重负：不管怎么说，人性尚且存在。同类不会相食，也不会把别人的一部份吞下去。当然，这件事可能会说明一些别的东西：比方说，咬掉的耳朵块太大，咬人的学生嗓子眼太细，但这些可能性我都不愿意考虑。我说到这件事，是想说明我自己曾在沉默中学到了一点东西，而这些东西是好的。这是我选择沉默的主要原因之一：从话语中，你很少能学到人性，从沉默中却能。假如还想学得更多，那就要继续一声不吭。

有一件事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可以在沉默和话语两种文化中选择。我个人经历过很多选择的机会，比方说，插队的时候，有些插友就选择了说点什么，到“积代会”上去“讲用”，然后就会有些好处。有些话年轻的朋友不熟悉，我只能简单地解释道：积代会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讲用是指讲自己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参加了积代会，就是积极分子。而积极分子是个好意思。

另一种机会是当学生时，假如在会上积极发言，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就可能当学生干部，学生干部又是个好意思。这些机会我都自愿地放弃了。选择了说话的朋友可能不相信我是自愿放弃的，他们会认为，我不会说话或者不够档次，不配说话。因为话语即权力，权力又是个好意思，所以的确有不少人挖空心思要打进话语的圈子，甚至在争夺“话语权”。我说我是自愿放弃的，有人会不信——好在还有不少人会相信。主要的原因是进了那个圈子就要说那种话，甚至要以那种话来思索，我觉得不够有意思。据我所知，那个圈子里常常犯着贫乏症。

二十多年前，我在云南当知青。除了穿着比较乾净、皮肤比较白晰之外，当地人怎么看待我们，是个很费猜的问题。我觉得，他们以为我们都是台面上的人，必须用台面上的语言和我们交谈——最起码在我们刚去时，他们是这样想的。这当然是一个误会，但并不讨厌。还有个讨厌的误会是：他们以为我们很有钱，在集市上死命地朝我们要高价，以致我们买点东西，总要比当地人多花一两倍的钱。

后来我们就用一种独特的方法买东西：不还价，甩下一叠毛票让你慢慢数，同时把货物抱走。等你数清了毛票，连人带货都找不到了。起初我们给的是公道价，后来有人就越给越少，甚至在毛票里杂有些分票。假如我说自己洁身自好，没干过这种事，你一定不相信；所以我决定不争辩。终于有一天，有个学生在这样买东西时被老乡扯住了；但这个人决不



是我。那位老乡决定要说该同学一顿，期期艾艾地憋了好半天，才说出：哇！不行啦！思想啦！斗私批修啦！后来我们回家去，为该老乡的话语笑得打滚。可想而知，在今天，那老乡就会说：哇！不行啦！五讲啦！四美啦！三热爱啦！同样也会使我们笑得要死。从当时的情形和该老乡的情绪来看，他想说的只是一句很简单的话，那一句话的头一个字发音和洗澡的澡有些相似。

我举这个例子，绝不是讨了便宜又要卖乖，只是想说明一下话语的贫乏。用它来说话都相当困难，更不要说用它来思想了。话语圈子里的朋友会说，我举了一个很恶劣的例子————我记住这种事，只是为了丑化生活；但我自己觉得不是的。还有一些人会说，我们这些熟练掌握了话语的人在嘲笑贫下中农，这是个卑劣的行为。说实在的，那些话我虽耳熟，但让我把它当众讲出口来，那情形不见得比该老乡好很多。我希望自己朴实无华，说起话来，不要这样绕嘴，这样古怪，这样让人害怕。这也是我保持沉默的原因之一。

中国人有句古话：敬惜字纸。这话有古今两种通俗变体：古代人们说，用印了字的纸擦屁股要瞎眼睛；现代有种近似科学的说法：用有油墨的纸擦屁股会生痔疮。其实，真正要敬惜的根本就不是纸，而是字。文字神圣。我没听到外国有类似的说法，他们那里神圣的东西都与上帝有关。人间的事物要想神圣，必须经过上帝或者上帝在人间代理机构的认可。听说，天主教的主教就需要教皇来祝圣。相比之下，中国人就不需要这个手续。只要读点书，识点字，就可以写文章。写来写去，自祝自圣。这件事有好处，也有不好处。好处是达到神圣的手续甚为简便，坏处是写什么都要带点“圣”气，就丧失了平常心。我现在在写字，写什么才能不亵渎我神圣的笔，真是个艰巨的问题。古代和近代有两种方法可以壮我的胆。古代的方法是，文章要从夫子曰开始。近代的方法是从“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开始。这两种方法我都不拟采用。其结果必然是：这篇文字和我以往任何一篇文字一样，没有丝毫的神圣性。我们所知道、并且可以交流的信息有三级：一种心知肚明，但既不可说也不可写。

另一种可说不可写，我写小说，有时就写出些汉语拼音来。最后一种是可以写出来的。当然，说得出的必做得出，写得出的既做得出也说得出；此理甚明。人们对最后这类信息交流方式抱有崇敬之情。在这方面我有一个例子：我在云南插队时，有一阵是记工员。队里的人感觉不舒服不想上工，就给我写张假条。有一天，队里有个小伙子感觉屁股疼，不想上工。他可以用第一种方式通知我，到我屋里来，指指屁股，再苦苦脸，我就会明白。用第二种方法也甚简便。不幸他用了第三种方式。我收到那张条子，看到上面写着“龟头疼”，就照记下来。后来这件事就传扬开来，队里的人还说，他得了杨梅大疮，否则不会疼在那个部位上。因此他找到我，还威胁说要杀掉我。经过核实原始凭据，发现他想按书面语言，写成臀部疼，不幸写成了“电布疼”，除此之外，还写得十分歪歪斜斜。以致我



除了认作龟头疼，别无他法。其实呢，假如他写屁股疼，我想他是能写出的；此人既不是龟头疼，也不是屁股疼，而是得了痔疮；不过这一点已经无关紧要了。要紧的是人们对于书面话语的崇敬之情。假如这种话语不仅是写了出来，而且还印了出来，那它简直就是神圣的了。但不管怎么说罢，我希望人们在说话和写文章时，要有点平常心。屁股疼就说屁股疼，不要写电布疼。至于我自己，丝毫也不相信有任何一种话语是神圣的。缺少了这种虔诚，也就不配来说话。我所说的一切全都过去了。似乎没有必要保持沉默了。如前所述，我曾经是个沉默的人，这就是说，我不喜欢在各种会议上发言，也不喜欢写稿子。这一点最近已经发生了改变，参加会议时也会发言，有时也写点稿。对这种改变我有种强烈的感受，有如丧失了童贞。这就意味着我违背了多年以来的积习，不再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了。

我还不致为此感到痛苦，但也有一点轻微的失落感，我们的话语圈从五十年代起，就没说过正常的话：既鼓吹过亩产三十万吨钢，也炸过精神原子弹。说得不好听，它是座声名狼藉的疯人院。如今我投身其中，只能有两种可能：一是它正常了，二是我疯掉了，两者必居其一。我当然想要弄个明白，但我无法验证自己疯没疯。在这方面有个例子：当年里根先生以七十以上的高龄竞选总统，有人问他：假如你当总统以后老糊涂了怎么办？里根先生答道：没有问题。假如我老糊涂了，一定交权给副总统。然后人家又问：你老糊涂了以后，怎能知道自己老糊涂了？他就无言以对。这个例子对我也适用：假如我疯掉了，一定以为自己没有疯。我觉得话语圈子比我容易验证一些。

假如你相信我的说法，沉默的大多数比较谦虚、比较朴直、不那么假正经，而且有较健全的人性。如果反过来，说那少数说话的人有很多毛病，那也是不对的。不过他们的确有缺少平常心的毛病。

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些社会学研究，因此接触了一些“弱势群体”，其中最特别的就是同性恋者。做过了这些研究之后，我忽然猛省到：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在中国，人们以为同性恋者不存在。在外国，人们知道同性恋者存在，但不知他们是谁。有两位人类学家给同性恋者写了一本书，题目就叫做《Wordisout》。然后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属于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没能力、或者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人有些隐情不便说话；还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我就属于这最后一种。

对我来说，这是青少年时代养成的习惯，是一种难改的积习。小时候我贫嘴聊舌，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就开始沉默寡言。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不会说话——在私下里我说的话比任



何人都不少——这只意味着我放弃了权力。不说话的人不仅没有权力，而且会被人看作不存在，因为人们不会知道你。

我曾经是个沉默的人，这就是说，我不喜欢在各种会议上发言，也不喜欢写稿子。这一点最近已经发生了改变，参加会议时也会发言，有时也写点稿。对这种改变我有种强烈的感受，有如丧失了童贞。这就意味着我违背了多年以来的积习，不再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了。我还不至为此感到痛苦，但也有一点轻微的失落感。现在我负有双重任务，要向保持沉默的人说明，现在我为什么要进入话语的圈子；又要向在话语圈子里的人说明，我当初为什么要保持沉默，而且很可能在两面都不落好。照我看来，头一个问题比较容易回答。我发现在沉默的人中间，有些话永远说不出来。照我看，这件事是很不对的。因此我就很想要说些话。当然，话语的圈子里自然有它的逻辑，和我这种逻辑有些距离。虽然大家心知肚明，但我还要说一句，话语圈子里的人有作家、社会科学工作者，还有些别的人。出于对最后一些人的尊重，就不说他们是谁了——其实他们是这个圈子的主宰。我曾经是个社会科学工作者，那时我想，社会科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发掘沉默。就我所知，持我这种立场的人不会有好下场。不过，我还是想做这件事。

第二个问题是：我当初为什么要保持沉默。这个问题难回答，是因为它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感觉。一个人决定了不说话，他的理由在话语圈子里就是说不清的。但是，我当初面对的话语圈和现在的话语圈已经不是一个了——虽然它们有一脉相承之处。

在今天的话语圈里，也许我能说明当初保持沉默的理由。而在今后的话语圈里，人们又能说明今天保持沉默的理由。沉默的说明总是要滞后于沉默。倘若你问，我是不是依然部份地保持了沉默，就是明知故问——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决定了要说说昨天的事。但是要慢慢地说。

七八年前，我在海外留学，遇上一位老一辈的华人教授。聊天的时候他问：你们把太太叫做“爱人”——那么，把 lover 叫做什么？我呆了一下说道：叫作“第三者”罢。他朝我哈哈大笑了一阵，使我感觉受到了暗算，很不是滋味。回去狠狠想了一下，想出了一大堆：情人、傍肩儿、拉边套的、乱搞男女关系的家伙、破鞋或者野汉子，越想越歪。人家问的是我们所爱的人应该称作什么，我竟答不上来。倘若说大陆上全体中国人就只爱老婆或老公，别人一概不爱，那又透着虚伪。最后我只能承认：这个称呼在话语里是没有的，我们只是心知肚明，除了老婆和老公，我们还爱过别人。以我自己为例，我老婆还没有和我结婚时，我就开始爱她。此时她只是我的女朋友。根据话语的逻辑，我该从领到了结婚证那一刻开始爱她，既不能迟，也不能早。不过我很怀疑谁控制自己感情的能力有这么老到。由此可以得到两个推论：其一，完全按照话语的逻辑来生存，实在是困难得很。其



二：创造话语的人是一批假正经。沿着第一个推理前进，会遇上一堆老话。越是困难，越是要上；存天理灭人欲嘛——那些陈糠烂谷子太多了，不提也罢。让我们沿着第二条道路前进："爱人"这个字眼让我们想到什么？做爱。这是个外来语，从 make love 硬译而来。本土的词儿最常用有两个，一个太粗，根本不能写。另外一个叫做"敦伦"。这个词儿实在有意思。假如有人说，他总是以敦厚人伦的虔敬心情来干这件事，我倒想要认识他，因为他将是我所认识的最不要脸的假正经。为了捍卫这种神圣性，做爱才被叫作"敦伦"。

现在可以说说我当初保持沉默的原因。时至今日，哪怕你借我个胆子，我也不敢说自己厌恶神圣。我只敢说我厌恶自己说自己神圣，而且这也是实情。

在一个科幻故事里，有个科学家造了一个机器人，各方面都和人一样，甚至和人一样的聪明，但还不像人。因为缺少自豪感，或者说是缺少自命不凡的天性。这位科学家就给该机器人装上了一条男根。我很怀疑科学家的想法是正确的。照我看来，他只消给机器人装上一个程序，让他到处去对别人说：我们机器人是世界上最优越的物种，就和人是一样的了。

但是要把这种经历作为教学方法来推广是不合适的。特别是不能用咬耳朵的方法来教给大家人性的道理，因为要是咬人耳的话，被咬的人很疼，咬猪耳的话，效果又太差。所以，需要有文学和社会科学。我也要挤入那个话语圈，虽然这个时而激昂、时而消沉，时而狂吠不止、时而一声不吭的圈子，在过去几十年里从来就没教给人一点好的东西，但我还要挤进去。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雷颐：有关群体性狂热



雷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

他们“觉得每个人都得到召唤，要把渺小的‘我’融化到那火热的群众中去，以便在其中克服各种私心。地位、语言、阶级、宗教信仰的一切差别都被那短暂的团结一致的狂热感情所淹没……每个人都经历着一个提高‘自我’的过程；他不再是一个早先孤立的人，而是群众的一分子，他是人民，是人民中的一员；人民中平时不受尊敬的人得到了重视。”

”

对大多数欧洲平民来说，1914 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突如其来、毫无准备的。这样重大的事件事先似乎全无预兆，以至连对时局一向关心、对战争抱有相当警惕的茨威格在大战爆发前夜还与往常一样，优哉游哉地前往风光如画、游人如织的比利时海滨度假，并自信地与人打赌说肯定不会打仗，否则就把自己吊死在那根夜灯杆子上。但言犹在耳，战争却如晴天霹雳般突然爆发，茨威格只得中断度假，匆匆乘火车离开比利时回国，于第二天早上回到维也纳。

不寒而栗一秒钟

但出乎意料的是，这天早晨他发现维也纳的街头此时竟充满了一种节日的气氛。到处是彩带、旗帜、音乐，全城的人此时都开始头脑发昏，处于亢奋状态，对战争的最初恐惧马上就变成了满腔热情。他写道：“说实在话，我今天不得不承认，在群众最初爆发出来的情绪中确有一些崇高的、吸引人的地方，甚至有使人难以摆脱的诱人之处……成千上万的人尽管在战前的和平时期相处得比较好，但是从来没有像战争刚开始时的那种感情：觉得他们属于一个整体。”正是这种整体感，使他们“觉得每个人都得到召唤，要把渺小的‘我’融化到那火热的群众中去，以便在其中克服各种私心。地位、语言、阶级、宗教信仰的一切差别都被那短暂的团结一致的狂热感情所淹没……每个人都经历着一个提高‘自



我’的过程；他不再是一个早先孤立的人，而是群众的一分子，他是人民，是人民中的一员；人民中平时不受尊敬的人得到了重视。”

的确，在和平年代“日常生活”机械刻板地日复一日，生活本身似乎就是目的，人们为活着而活着，“普通人”似乎永远都是“普通人”。而战争这类巨大的历史事件使不少人感到枯燥的日常生活突然中断，建功立业不仅“可望”而且“可及”，“普通人”开始成批成打地成为“英雄”，一大批原来不知名的“小人物”突然成为众人瞩目的叱咤风云之辈，人们感到了一种超越生活、远在生活之上的更为崇高的目的和意义，生活因此而充满激情与浪漫……但茨威格意识到，这种“热烈的陶醉混杂着各种东西：牺牲精神和酒精；冒险的乐趣和纯粹的信仰；投笔从戎和爱国主义言词的古老魅力。那种可怕的、几乎难以用言词形容的、使千百万人忘乎所以的情绪，霎时间为我们那个时代的最大犯罪行为起了推波助澜、如虎添翼的作用”（《昨日的世界》，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82-183 页）。

平民百姓如此狂热，使他突想起这年春天在一座法国小城经历的不寒而栗的一秒钟。法国小城图尔安静闭塞，令人有昏昏欲睡之感，茨威格晚上无事，以看电影打发时间。那是家郊区简陋电影院，观众都是工人、士兵、小贩等真正的老百姓。正片映出前先放映“各地新闻”，映出英国的划船比赛、法国的阅兵时，观众彼此谈笑自若，并不在意。但是，第三条是德国威廉皇帝会见奥地利约瑟夫皇帝的新闻。就在威廉皇帝出现在画面上的那一瞬间，昏黑的影厅开始完全自发地响起一阵尖厉的口哨声和跺脚声，男人、女人、孩子，所有人都在嘲笑，好像有人侮辱了他们似的。茨威格顿时大为震惊：“善良的图尔人除了知道自己报纸上登载的消息外，并不知道关于政治和世界更多的事。可是他们在那一秒钟之内就像疯了似的。我感到吃惊。我浑身不寒而栗。因为我感到经过多年来煽动仇恨的宣传，流毒是多么深，甚至在这里，在一座外省的小市镇，这些毫无恶意的市民和士兵都已经对威廉皇帝、对德国抱有这样的成见，以致银幕上一幅匆匆而过的画面就能引起这样一场骚动。那只不过是一秒钟，仅仅一秒钟。”当接着映出其它画面时，观众又把刚才的一切全都忘记，喜剧正片放映时个个捧腹大笑，直拍大腿，劈啪作响。但茨威格却再也不能平静：“尽管那仅仅是一秒钟，但那一秒钟却让我看到了，虽然我们自己做了各种努力，想方设法要促进互相的谅解，但是到了紧急关头，彼此双方的人民是多么容易被煽动起来。”闭塞小城低层百姓这短短“一秒钟”，却是掌控着各种媒介的执政者长期教育的结果。

战争爆发后，使茨威格更感震惊的是，当时的大多数作家也以狂热的言词宣扬对敌国的仇恨和战争，绝大多数作家都以狂热的文字鼓吹“为祖国而战”，“他们以为鼓动群众的热情和用富有诗意的号召或者科学的意识形态来为美化战争打基础，这就是他们所能做的最



好的贡献。”在茨威格的周围，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像古老的日耳曼时代那样，用诗歌和文字来激励士气，鼓舞冲杀。“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们这样干，背叛了作家的真正使命：作家是人类一切人性的维护者和保卫者。”而“更恶劣的是学者们的活动”，他们唯一的“高论”就是把战争解释为能振奋人民力量的“洗礼”。

茨威格的熟人、诗人和剧作家恩斯特·利骚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他出生于一个富有的德国犹太人家庭，是茨威格所认识的最普鲁士化或者说是被普鲁士同化得最彻底的犹太人。对利骚来说，德国文化无与伦比，德国利益至高无上，总之，德国就是一切，他似乎比那些“真正的”德国人更加热爱、信赖德国。

战火乍起，德英宣战，利骚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首名为《憎恨英国》的诗歌，以简单、干脆而富感染力的文字在民众中煽起对英国的强烈仇恨。这首诗就像一枚炸弹扔进了弹药库，激起巨大反响，德国从来没有一首诗像这首诗一样如此迅速地传遍全国。“各家报纸都转载了那首诗；教师们在学校里把它念给孩子们听。军官们走到前线，把它朗诵给士兵们听，直至每一个士兵能把那仇恨经背得滚瓜烂熟。但是这还不够。那首小诗被配上乐曲和改编成大合唱，在剧场演出。不久，在 7000 万德国人中再也没有一个人不从头至尾知道《憎恨英国》那首诗的。”以至德国皇帝都为这首诗中的爱国激情深深感动，授予他一枚红色的雄鹰勋章，以资鼓励。总之，“一夜之间，恩斯特·利骚红得发紫，享受到一名诗人在那次战争中的最高荣誉。”

超脱于混战之上

面对这种状况，茨威格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向利用当时群众热情的这种背叛理性的行为作斗争，为反对战争而斗争。“我知道我要反对的敌人——那种把他人置于痛苦与死亡的错误的英雄主义；那种丧失良知的预言家们的廉价的乐观主义”，“在这两种主义背后，用金钱收买的合唱队也是我的敌人”。但这种斗争异常困难，因为谁反对战争“谁就会被打成叛徒。时代几经变迁，但总是这一帮子人，他们把谨慎的人称为胆小鬼，把有人性的人称为软弱的人；而在他们轻率地招惹来的灾难降临的时刻，他们自己也手足无措了”（第 203 页）。这种貌似“崇高”的“道德优势”不仅为群体的狂热火上浇油，而且使反对者居于“道德劣势”而难以启齿，非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而不敢为。但茨威格明知不可为却勇而为之，积极着文反战，还用戏剧的形式描写、肯定在狂热的时刻被认为是软弱的胆小鬼而遭人蔑视的“失败主义者”。不过，茨威格马上发现自己被所有的朋友所孤立，以至于他也常常怀疑究竟是众人皆醉唯我独醒，抑或确是别人聪明自己发了疯。

但是，毕竟还有一个伟大的心灵与他一同跳动。罗曼·罗兰在大战爆发前就不断向人们呼吁：“现在是一个需要保持警惕的时代，而且愈来愈需要警惕。煽起仇恨的人，按照他们



卑劣的本性，要比善于和解的人更激烈、更富于侵略性，在他们背后还隐藏着物质利益。”战争爆发后，罗曼·罗兰更是积极、勇敢地公开反战。他与茨威格，这两个交战国的伟人走向一起，联合反战，在知识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茨威格发表了名为《致外国的朋友们》的文章，表示反对战争、与敌国的朋友仍保持原来的朋友关系；罗曼·罗兰发表了《超脱于混战之上》的反战文章，抨击国家间的仇恨精神，要求艺术家在战争中也要主持正义与人道。

由于战时媒体的审查制度，敌国的作品很难发表，本国读者很难读到这些反战作品。因此，他们甚至以写“批判文章”的方式让本国人民也能看到这些敌国思想家写的反战文章。在他们周围，人数不多的反战作家渐渐团聚起来。

生长于布拉格的奥地利犹太作家卡夫卡此时尚属籍籍无名之辈，只发表了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但在小说《往事一页》中也甘冒触犯众怒之险，表明了自己对战争的反对态度。

小说中的“我”是一个小小的鞋匠，修鞋铺就开在皇宫面前的广场上。一天清晨开门一看，发现全城不知何时已被来自远方的游牧民族占领。侵略者虽是为了皇宫中的金银财宝而来，但烧杀抢掠从平民开始，鞋匠、肉贩等都备受骚扰。这时，“我”来到皇宫门口，看到皇帝站在一扇窗后。“平常，他可从不到宫内靠广场的房间来，而总是生活在最里面的花园中”，这次却垂头丧气地站在靠广场的窗后，眼睁睁地看着宫前发生的事情。

最终，不堪种种磨难之苦的平头百姓们聚在一起互相问道：“我们要承受这样的负担和磨难到什么时候呢？皇上的宫殿把游牧人吸引来，他却没办法把他们赶出去。宫门始终闭着；往常耀武扬威地出出进进的卫队，眼下全待在装了铁栅的窗户后面。拯救祖国的事结果全得由我们工匠和商人来干，这样的重任我们却担当不起哩。”（《卡夫卡短篇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29 页）

这篇寓言性小说发表于 1917 年，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仍在激烈进行，千千万万平民百姓正在慷慨激昂地为国家浴血奋战，为“救国”而英勇牺牲，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更是气焰万丈。卡夫卡显然对此非常不以为然，以小说来消解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绪。以一篇全文还不到两千字的小说消解千百万人着魔般亢奋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绪，无疑连杯水车薪都不如，但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不仅表明了一个作家应有的理性，更表现了作家应有的良知和勇气。退一步说，至少是作家个人在大是大非前表明自己的态度。小说的故事情节虽然简单，却使人久久回味。这篇小说起码从某一角度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

在“天下”“兴”的时候，皇帝们总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从不认为“匹夫有责”、“与有荣焉”，自然也就不许匹夫有参政议政、“参与”国家大事的权利；但每当“天



下”将“亡”的时候，皇帝们总是疾呼“匹夫有责”，仿佛事之所以至此人人都要承担一份罪责，匹夫自然就有承担“救亡”重担的责任与义务。

话当然要说回来，如果“天下”不是“一姓”之天下，而是所有匹夫也都享有一份权利的“天下”，那么自然应担起“救亡”之责；不过如果“天下”为某“一姓”之私物，当皇帝大呼“匹夫有责”时，鞋匠、肉贩……所有平民百姓确应冷静想想自己是否真的“有责”。很可能，“拯救祖国”“这样的重任我们却担当不起哩”！卡氏此言，可谓语重心长。

痛定思痛

经过了几年战争的残酷，群众初期的狂热渐渐冷却下来，反战、和平终于成为普遍的情绪和愿望，但人们已经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对突发重大事件最初的群体性反应，往往是未经深思熟虑、因而更多地反映出人性中值得注意的本能、本性。面对汹汹群情，是以更激烈、更富于侵略性的东西使之更加狂热（在一些漂亮的言词后很可能“还隐藏着物质利益”，自己其实并不“牺牲”），结果酿成大祸，还是冒大不韪使之更为冷静、理性，努力防止，起码是减轻灾难，是对每一位“知识者”的理性和道德的真正考验。

现实其实非常势利，常常会把人狠狠捉弄一番。那个狂热“爱国”、鼓吹战争的恩斯特·利骚立刻被人弃如敝屣。茨威格写道：“战争刚一过去，商人们又想要做生意，政治家们真诚地为促进互相谅解而努力，人们想尽一切办法要抛弃那首要求和英国永远为敌的诗。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大家把可怜的‘仇恨的利骚’斥之为当时鼓吹疯狂的歇斯底里仇恨的唯一罪人。”那些在 1914 年热情赞美利骚的人到了 1919 年却对他避之唯恐不及，“报纸不再发表他的诗作。当他在同伴中间露面时，立刻出现难堪的沉默。后来，这位孤独者被希特勒赶出他全心全意为之献身的德国，并且默默无闻地死去，他是那首诗的悲惨的牺牲品，那首诗曾把他捧得很高，为的是以后把他摔得粉碎。”这一切，又能怪谁呢？

相反，正是罗曼·罗兰坚定的反战立场最后赢得世人的高度尊敬。茨威格写道：“当时罗曼·罗兰通过自己单枪匹马、或者说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向千百万人的那种丧失理智的仇恨所作斗争而产生的使人振作的鼓舞力量是无法估计的，只有我们——那个时代的见证人才懂得他的一生和他的堪称表率的不屈不挠在当时意味着什么。染上了狂犬病的欧洲正是由于他才保存了自己的道义和良知。”在罗曼·罗兰身上，他“看到了另一种英雄主义，即那种有思想的英雄主义、有道德的英雄主义。”

（本文来自《爱思想》网）




我在中國
論壇
Co-China

周晓虹：集群行为：理性与非理性之辩


周晓虹，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 **在集群中，群众毫无疑问是易受暗示的、偏执的、感情化的，即是非理性的，但公众却是承认其成员个人之间在价值和兴趣上的差异和对立的，是有批判力并富于理性的. 不过，帕克在作这种划分时并不是信心十足的，因为他自己也无法解释“理性”的公众为何还会受到“非理性”的利用和操纵。**

当我们论及集群行为时,就像一位对命运捉摸不定的赌徒将手伸向一只鼓鼓囊囊的“摸彩袋”。这只袋子里盛放着各种从表面上看来不但毫不相关甚至大相庭径的现象:从暴乱、骚动、恐慌、狂热、时尚、流言、谣言直至各种社会运动。

集群行为英文写成 Collective Behavior,又译作“集聚行为”或“聚合行为”，它是与处在既定的社会规范的制约之下的群体行为相对而言的。“它包括人们成群向银行去挤兑；剧场里火警之声大作，观众仓惶逃脱；在一部分人中兴起的某种一时的爱好(跳呼拉圈舞和滑板风行一时)；群体发财之梦(当年在法国与约翰·劳的密西西比开发公司有关的股票投机狂潮)；充满敌汽且又无组织的示威行动；暴乱；群体行为；服饰的流行以及宗教的狂热等。”①

从古斯塔夫·黎朋和西皮奥·西格尔时代起，社会心理学家就一直尝试着从理论上对集群行为加以概括。罗伯特·帕克认为，“集群行为是在公共和集体冲动的影响下发生的个人行为，换句话说，那是社会互动的结果”②；戴维·波普诺则更为详细地指出，集群行为“是指那些在相对自发的、无组织和不稳定的情况下，因为某种普遍的影响和鼓舞而发生的行为’，③。这类定义企图为我们刚才捉摸不定的那只“摸彩袋”里的各种现象找到相互关联的特征:即集群行为具有自发性、不稳定性和无组织性。长期以来，许多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都大体上持上述看法。即认为，集群行为的产生，一般来说是自发的，尽管某些集群行为或源于某些人的挑唆，或源于某个社会团体(如企业)的策动，但绝大多数的参与者并不是受到什么明确的指令，而是受到他人的影响自愿加入集群行为的行列之中的；集群行为是短暂的、不稳定的，它几乎总是一种一哄而起、转眼即逝的现象，不可能



持续稳定地存在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最后，集群行为又是无组织的，如果把各种社会行为排列成为一个从最有组织性到最无组织性这样一个等级序列的话，集群行为当然处于最无组织性这一端。

在整个现代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构架中，大多有关集群行为现象的研究都倾心于解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个体行为是怎样转化为集群行为的?最早进行这种理论尝试的是古斯塔夫·黎朋，他的着眼点是集群行为的最基本的形式之一——群众(另一基本形式是大众)。黎朋将群众视为“一群人的聚合”，而由个人聚合而成的群众具有“完全不同于组成它的个体特征的新特征……”。④具体说来，“无论组成群众的是什么人，无论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职业、他们的性格或他们的智力是否接近，他们已转变为群众这一事实会使他们具有一种集体心理，使他们以一种与他们各自独处时完全不同的方式去感受、思考和行动。”⑤黎朋明确意识到了经聚合而成的群众具有了作为单个个人所没有的特征，但单凭这点显然还不足以说明群众乃至整个集群行为。因为按R·布朗的观点来看，“科学必须解释为什么会出现群体性的感

情的突然迸发，那种富有感情色彩的行为是通过什么途径蔓延到整个群体并形成同质的思想和行动的。”⑥黎朋是以具有催眠性质的暗示感受性来作为上述问题的答案的。具体来说，受塔德的影响，黎朋认为群众具有神经质的感染因素，并具有以下三大特征:(1)去个性化，即由于置身于许多人中，个人便确信有一种难以克服的力量使自己不能不屈服于本能；(2)感情作用大于理智作用，这容易导致群众易受相互间的暗示与感染；(3)失去个人责任感，这容易导致对情欲和行为缺乏控制。

象许多研究者指出的那样，黎朋的语言带有浓郁的法国贵族意识以及由此而来的某种偏见，但他所指出的集群行为中的暗示与感染的作用确实是显而易见的.要了解黎朋的这种解释的影响力与持久力，对黎朋之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近百年历史加以简单的审视是既简单而又有效的方法。以下文字是不同社会心理学家对集群行为的同质性即行为的蔓延现象所作的五种常见解释:

麦独孤:个人的天性为他人的感情表达所唤醒.这种理论典型地体现了麦独孤的本能论和黎朋的感染论的“杂交”:即，群众同质性的过激行为是初级本能和情绪互动的结果。

奥尔波特:社会促进论。这种理论从实验入手，证明了同黎朋一样的假设:处在群体之中的个体是与独处的个体不同的.在乘法运算、可逆透视、联想速度和心理物理比较等一系列测验中，奥尔波特都发现并证实了他人在场对一个人完成任务具有促进作用。⑦那么，处于集群之中的个体是否也会因此增进自己的模仿倾向和行为力度呢?布鲁默、K·兰和G·兰：循环反应。这一理论认定集群行为产生于社会互动，而不是黎朋所说的什么“集群



意向”。具体说来，人群中的情绪感染是一个“由他人的情绪在自己身上引起同样的情绪的过程。它转过来又加剧了他人的情绪”⑧。

特纳：紧急规范的作用。这种理论认为，在集群中由于相互间的社会影响，从个别人的可见行为中产生出了新的规范，这些规范确定了在集群环境中适当行为的标准。在一些模棱两可的情况下，个别的行动者就可以为其它大多数成员确定规范.而群众一旦觉察到指导他们行动的新规范出现，就会感觉到执行它的压力。⑨

斯梅尔塞:价值累加理论。这一理论被誉为集群行为研究领域半个世纪中“里程碑式的著作”，其基本的理论基础来自经济学:它假定集群行为的产生都有一个确定的模式，可以把集群行为在发展的每一阶段理解为“追加价值”，其后才有最终产品，即集群行为的出现。决定集群行为的六个具体因素是:（1）结构性助长；（2）结构性压抑；(3)普遍的信条；(4)催化因素；(5)行动动员；（6)社会控制机制.集群行为的孕育取决于前五个因素，而集群行为最终是否发生则要看社会控制手段是否成功。⑩

尽管上述五种理论与黎朋的感染论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但它们和感染论的立足点却是基本一致的:即这些解释大都不认为集群行为的行动者是有目的地采取行动的，换言之，参与集群行为的个人不过是某种感情的载体，对于他们是没有任何理性可言的。

试图改变这种理论潮流，即将集群行为同样理解为个人在集群状态下的一种理性行为(其中涉及行为的代价和报酬的比较)的社会学家，是美国人詹姆斯·科尔曼。他认为，完全可以不用“循环反应”、“社会促进”等概念来解释集群行为的蔓延，集群行为的产生原因是其成员经过理性的权衡将自己行动的部分控制权转让给了他人(即根据他人的行动，来决定自己做什么).控制转让给始作俑者的结果(始作俑者则将控制转让给各种大众媒介)。表 1-1 是一种与交换论者蒂博特和凯利的矩阵分析十分相似的报酬结构矩阵。其中，表示结果的 0、1、2、3(行中的数字)代表始作俑者报酬由少到多的排列；面 0, 2(列中的数字)则代表追随者的报酬的多与少。在博弈矩阵中，假设三方中的任何一方可选择的行为为潮流 1 和潮流 2。



表 1-1 始作俑者与追随者面临的保酬结构

		大众媒介			
		潮流 1		潮流 2	
		追随者			
		潮流 1	潮流 2	潮流 1	潮流 2
始作俑者	潮流 1	2，2	3，0	0，2	1，0
	潮流 2	1，0	0，2	3，0	2，2

由表显示，对时尚追随者而言，无论始作俑者倡导哪一种潮流，只要跟定他们就有利可图。因此，追随者把控制转让给始作俑者，可以使自身利益得以满足。而始作俑者则在这样两种情况下可以使自身利益得到满足:其一，接受大众媒介倡导的潮流，即转让部分控制给大众媒介；其二，倡导追随者尚未选择的潮流，即将剩余的控制转让给追随者(否定性地转让，指与追随者背道而驰、标新立异)。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一般大众受始作俑者影响追随潮流 1，而大众媒介倡导潮流 2，从报酬结构可知，始作俑者的报酬由代表中等水平从 2 降至 0，而追随者所获的报酬始终维持在 2 这一高水平上。因此，始作俑者发现，只有服从大众媒介，使自己有别于一般的追随者，即倡导潮流 2，才符合自身利益。从表中可知，他可以获得最高报酬 3。接着，由于上述导向，追随者也转而采纳潮流 2，并获高报酬 2，同时又使始作俑者的报酬水平由 3 为 2。可以设想，当大众媒介又倡导新的潮流，始作俑者的报酬又由中等降至最低水平，为了增加个人利益，他必然会倡导新的潮流，而这又会带动追随者。如此循环往复，形成行动系列。

科尔曼接下去又根据转让控制的程度差异，将始作俑者和追随者划为四种人。在表 1-2 中除了始作俑者和追随者外，扩散者把对自身行动的控制转让给始作俑者，同时又接受追随者的转让，他们在时尚行为中的作用类似放大器：而独立行动者虽和始作俑者一样，不受该系统中的其它人的影响，但也没有人受他影响(既不转让也不接受控制)。分析到这样的层次后，无论是科尔曼还是我们都有理由相信，在一社会系统内部众多理性扩散者的存在，是一种社会时尚得以普及或曰蔓延的最重要条件。用科尔曼自己的话说:正是“他们把控制转让给导向者(即始作俑者)，使时髦行为具备了通过他们得以传播的条件。与此同时，其它人又把控制转让给他们.因此，一旦扩散者采取时髦行为，此种行为便被传播开来。如果系统内部存在大量扩散者，任何新的行动都可以通过转让控制的结构得以传播”⑿。



表 1－2 一系统内部由不同程度的控制转让而形成的四种角色

某人是否把控制转移给其他人	其他人是否把控制转移给某个人：是	其他人是否把控制转移给某个人：否
是	扩散者	追随者
否	始作俑者	独立行动者

我们不必在黎朋(及其后来者)与科尔曼之间匆匆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因为这“理性与非理性”之辨，从来就是集群行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而持久的争论” ⒀。1904 年，早在我们这里提及的许多学者步入该领域之前，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就在其博士论文《群众与公众》(The Crowd and The Public)中，欲图通过对群众和公众的划分，来解决这一争论，帕克认为，在集群的这两种基本形态中，群众毫无疑问是易受暗示的、偏执的、感情化的，即是非理性的，但公众却是承认其成员个人之间在价值和兴趣上的差异和对立的，是有批判力并富于理性的。⒁不过，帕克在作这种划分时并不是信心十足的，因为他自己也无法解释“理性”的公众为何还会受到“非理性”的利用和操纵。其实，像时狂、恐慌、谣言和流言这类常发生在公众中的社会心理现象也说明，公众确实有可能是非理性的。

本文尚无法提供一种非此即彼的答案。我们只想借上述两种彼此对立但又各有道理的看法说明，以往那种认为集群行为一定是非理性的流行观点现在看来是过于绝对了。集群行为既可能是理性的，也可能是非理性的，这取决于集群行为的具体形态以及具体形态的集群行为处在何种发展阶段。比如，群众行为一般具有非理性的特征，但由群众行为发展而来的社会运动有些却是十分理性的，它是进步分子进行社会变革的非制度化尝试。

注释

① 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16, 228, 259 页.

② OR.帕克等:《社会学导论》,1921 年英文版，第 865 页。

③ 波普诺:《社会学》(下册)，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66-567 页.

④ 黎朋:《群众》，1896 年英文版，第 26 页

⑤ 黎朋:《群众》，1896 年英文版，第 26 页

⑥ 布朗:《社会心理学》，1965 年英文版，第 734 页.



⑦ 奥尔波特:《社会心理学》，1924 年英文版，第 261 页。

⑧ 巴克:《社会心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78 页。

⑨ R. H.特纳:《集群行为》，载 R.法里斯主编《现代社会学手册》，1964 年英文版，第 382-425 页。

⑩ N.斯梅尔塞:《集群行为理论》，1963 年英文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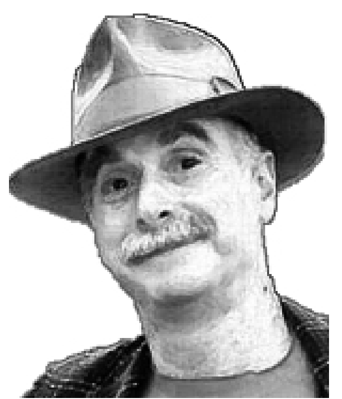
⑪ 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16, 228, 259 页

⑫ 埃尔斯那:《帕克的集群行为理论》，《国外社会学》1992 年 5-6 期。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Howard Rheingold：群体合作新时代



Howard Rheingold，《智慧的乌合之众》(Smart Mobs)一书的作者

> **我们可以说这些都是自私的行为，但是所有这些自私的行为加起来却成为了别的东西。如 EBay 成功的解决了企图困境，它通过建立一种反馈机制，把囚徒困境变成了“保险游戏”：游戏的双方不再因为相互的猜疑而止步不前，而是需要一方向另一方展示自己的诚信度，从而使得合作成为可能。**

今天我来到这里，是希望能邀请大家和我一道，加入探索者的行列，去探索人类集体行动背后的机理。

我们通常的看法是生物进化即战争，唯有强者可以生存。商业操作、国家的统治，也唯有依靠消灭他者才可能取得成功。而所谓政治，就是一方不惜一切代价去赢得选票。但是，我认为，我们今天已经能够看到一种新的“叙事”(narrative)正在隐隐的生成。在多个不同的领域里，我们看到了合作(cooperation)、协作(collective action)、复杂的相互依赖性(complex interdependency)这些特征正在浮现，而以往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的法则则正在慢慢的让位于前述的新特征。

在我撰写《智慧的乌合之众》的时候，我开始思考沟通(communication)、媒体(media)与协作(collective action)三者间的关系。而当我的书写好以后，我发现，人群间的沟通、媒体以及人群间的社会行为，三者在历史上是共同演化的。人类在步入农业社会之前的很长时间就已经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在游牧时期，人们通过打猎和拾果子，开始时人们只需找到能填饱肚子的食物就行了。而历史发展到某一个时期，人们开始集体捕杀大型动物。我们还不懂他们那时是怎么进行合作的，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就是要想捕获大型动物，比如乳齿象，人们只能通过合作才能取得成功。一种新的财富也由此生成，猎人家里积聚了他们自己吃不下的蛋白质。由此我们想到一个问题：那些吃得到乳齿象肉的人家是怎么和捕猎者达成协议的？我们今天还不能知晓其中的细节，但是非常肯定，必然有某种手势语在那个时候发展起来了。



而随着农业的兴起，人类第一次迈向文明。那时候出现了第一批泥砖构造的城市，以及第一批帝国。而正是这些帝国的领袖们雇佣了大量的农奴来看管麦子、羊群、水源和酒。同时帝国的领袖们也学会了在瓦砾上雕刻图案，来记录别人欠他们的租税。

在那不久之后，人们又发明了文字。可是这一强大的工具在数千年的时光里都仅仅被牢牢的掌握在贵族的手里，帝国发生的大事即通过文字得以流传下来。

又过了很多年，另一种有助于人们相互间实现沟通的技术被发明了，那就是印刷术。于是几十年间，数以百万计的人通过读书识字变得有文化、有教养。而识字的人多了，在知识、宗教以及政治等诸多领域，新的人群协作行为也开始出现。

科学界发生了革命、宗教界也掀起改革浪潮、宪政民主由幻想变成了现实。不是印刷术本身创造了这一切，而是印刷术给人们带来了识字的可能，识字的人多了，人们就有可能进行更多的协作。新的协作也带来了新的财富。

商业行为本身的历史渊源是很久的，可以说它和古驿道一样的悠久。但是支撑起我们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制度则仅仅有几百年的历史。股份合作公司、共同承担的责任保险、复式簿记等合作方式的出现铺就了资本主义的金光大道。

而今天，我们又迎来了一种新的革新性的技术，它就是互联网。在这个多对多（many to many）的时代，每一台电脑都可以成为印刷机、广播站、社区或市场。

而计算机行业的进化还在不断的加速。不久后，我们就有望看得到一种更彻底的进化，我们将看得到大街上人们都把超级计算机穿在身上，所有的计算机都以极高的速度相连，到那时候，我们今天最快的宽带都会显得相形见绌。

而现今的关于人群合作的研究大多关注“社交困境”的问题。今天我只讲其中两个：囚徒困境以及公共品悲剧。由于 Kevin Kelly 跟我说今晚的观众大都理解囚徒困境的意思。我就简单的谈谈吧，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找 Kevin Kelly。

囚徒困境实际上起源于博弈论当中的一个数学矩阵：参与比赛的双方是不可能相互信任的。每一次不安全的交易都是囚徒困境的体现。一位顾客和一位卖主在没有信任的情况下是不会进行交易的。谁也不想先吃亏。但是这么一来谁也得不到好处。而假如他们能够实现互信的话，就能把囚徒困境转化为保险游戏(insurance game)，唯有如此，他们才能走到下一步。

20 年前，Robert Axelrod 把囚徒困境放到生物进化的角度进行思考：要是我们是生物进化的产品，那么我们的先祖在生存竞争中就应当是非常强悍的，那合作又从何谈起？于是他设计出一套计算机模拟的程序，让参加者选择自己的策略。有一项非常简单的法则在第一



轮的较量中获胜，人们知道了这个事实后再来参加第二次角逐，发现这一法则在第二轮比赛中还是大获全胜。此即人们说的：一报还一报。

另一个不甚为世人所知的理论是最后通牒游戏（ultimatum game）。有两个参与游戏的人，他们之前从没有玩过这样的游戏，也不认识对方，他们也不会第二次玩这个游戏。两人被安置于不同的房间。我们给游戏者 A 一百美金，然后让他提出在两人之间划分这笔钱的方案。游戏者 B 要么接受 A 的划分方案，这样大家都能拿到钱，游戏结束；要么拒绝 A 的划分方案，两人都得不到报酬，游戏结束。

新经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会告诉你：有钱送到你手里，你不去拿（那钱可能仅仅是一美金，而对方则拿到九十九美金），那是非理性的。可是我们在美国、欧洲以及日本做了大量实验。结果显示，除非对方提出一个跟 50/50 的划分比较接近的方案，否则大多数人都会拒绝对方提出的方案。尽管他们都是第一次玩这样的游戏，但是他们似乎凭直觉知道唯有提出一个接近 50/50 的划分才有可能被对方接受。

最近有人类学家把这样的游戏带到一些原住民的部落里。他们去到了居住在亚马逊森林里的刀耕火种的原始居民、中亚游牧民族，以及其它十余个不同文化的部落里。所有这些民族对于何为公平的看法差异巨大。这表明，在我们的人类社会里并不存在一种天然的关于公平——现代社会经济交易之基石——存在一致的看法。不同的社会背景会对我们关于公平的看法发生影响，不管我们是否认识到这一事实。

另一个关于社会困境的解说就是“公共品悲剧”。Garrett Hardin 在 1960 年代的时候就演绎过这样一个例子：要是有一个公共牧场，每一位放牧者都会把最多的牲畜赶到那里，最终将会因为过度放牧而导致资源匮乏。Garrett 联系到人口过度增长的事实，指出任何一种公共的资源，只要没有外加的监管，都会不可避免的遭受毁坏。

1990 年，一位叫 Eleanor Ostrom 的政治科学家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人类是否总是会破坏公共品？为了寻找答案，这位科学家着手发掘一切可以找到的资料。

她察看了数千个人们共享水源、森林以及渔业资源的个案，发现确实存在很多的人们任意破坏公共品的例子。但她也发现了在很多的个案里，人们成功的逃脱了囚徒困境。事实上，公共品危机是一种多角色的囚徒困境。她同时指出，只有当人们心里觉得自己是囚徒的时候，才会遇到囚徒困境。

事实上，人们会通过建立某种有利于集体合作的机制来走出此困境。此外，她还发现，所有那些成功的机制都遵循一定的设计原则。缺乏这些设计原则的机制则无法起作用。



下面我将从不同的学科领域来具体的谈谈。在生物学里头，共生、群体选择以及进化心理学是几个颇具争议的理论，不过，生物界存在合作的机制则显然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从细胞到整个生物圈都是如此。

另外，我们今天关于个体作为独立的经济人的观念正在遭到挑战。理性的个体利益不总是占上风的因素。事实是，对于群体里的欺诈者，人们会采取惩罚的措施，哪怕这样会给他们自身带来一定的损失。

我刚才一直在讲在以往的日子里，新的沟通方式以及新媒体是如何创造出新的经济模式。我们知道商业是一种很古老的行为，市场也是历史悠久，但市场经济则是直到近代才出现的一种经济现象。而社会主义则是对此的一种回应。可是，在此之后将会有怎样的经济模式出现？

适才 James Surowiecki 提到 Yochai Benkler 关于开源的论述，并提到一种新的生产模式，即人对人的生产模式(peer-to-peer production)。在此，我想指出，我们今天也许正在走进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它与以往任何一种经济模式都存在本质的区别。

咱们先看看这些企业：[幻灯片上看到丰田、惠普、太阳微电子、IBM、索尼、亚马逊、eBay、Lily、Innocentive 等公司的 logo]。 IBM, HP, Sun 等企业是 IT 界的龙头企业，它们正在着力于把自己的软件“开源”出去，把一些自己的专利放到公共领地上去了。Eli Lilly 是一家实力很强的制药企业，也创造出一个为公众解决医药难题的资源库。

而丰田则不再把零件供应商当作是单独的商业伙伴，而是把它们当作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为它们提供培训，使他们生产出更优质的零部件，虽然他们也知道其竞争对手也会从这些零部件厂商进货。以上提到的多家企业没有一家是出于纯粹的利他主义而这么做。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某种程度的分享其实也会为自身带来好处。

开源软件社区向我们证明了像 Linux 和 Mozilla 这样的世界一流的软件的编写可以不需要某种官僚架构或市场利益的驱动。

Google 通过 AdSense 这个工具，在为无数的博客用户带来价值的同时，也为自身带来了更大的价值。亚马逊则通过开放 API，为无数家亚马逊在线书店的开设提供了可能。所有这些企业不是出于利他的心理而做出上述的行为的，他们这么做，在为他人带来价值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为自己带来了价值。

EBay 成功的解决了企图困境，它通过建立一种反馈机制，把囚徒困境变成了“保险游戏”：游戏的双方不再因为相互的猜疑而止步不前，而是需要一方向另一方展示自己的诚信度，从而使得合作成为可能。



维基百科依靠世界各地的志愿者编写出全球最大的免费的百科全书，有150万个条目，涵盖200多种语言，而这仅仅用了几年的时间。

ThinkCycle这个网站则帮助发展中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发布他们遇到的问题，全世界设计领域的学生都能为这些问题寻找解决的办法。在那上面还能找到海啸救济相关的方法。那是一种相当简单的方法，即使是不识字的人也会懂得应用，它可以使霍乱患者重新获得水的给养。

BitTorrent则把每一台下载的机子变成一个上传的结点，越是多人使用BT，整个系统就越有效率。

数以百万计的用户把他们闲置的计算资源贡献出来，他们把自己的机子连接到互联网上，形成一种超级计算机，为帮助医学家解开蛋白质叠合的难题提供帮助。还有的人把自己的计算机连到网上，成为超级计算机的一部分，Folding@Home就是这么一个项目，科学家希望通过这样的项目能够找到外星生物。

我想我们知道的还远远不够，甚至我们连最基本的法则是什么也还没搞清楚。但我想，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了。

我也没有时间一一对此加以演绎。我们可以说这些都是自私的行为，但是所有这些自私的行为加起来却成为了别的东西。在萨尔瓦多，内战的双方决定妥协，他们的行为就很明显的避免了囚徒困境。

在美国、菲律宾、肯尼亚，以及全球各地，市民开始利用手机短信的方式自发的组织政治抗议以及为选举人拉票。

一个类似于阿波罗登月那样的合作项目是否有可能？我们是否有可能通过跨领域的合作来研究人类合作的问题？

我相信这样的研究将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利益。我认为我们应当描画出与此相关的领域的地图，使得跨领域对话成为可能。不过，我的意思不是理解了人类的合作行为本身会使我们变得更完美。

有些时候，人们也会通过合作来干坏事。要提醒大家的是，几百年前，人们看到亲人因病死去，他们会认为那是罪孽或邪恶的幽灵的入侵所致。

笛卡尔说，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思考的方式，因为那时新的科学技术使得新的思考成为可能。生物学告诉人们是微生物导致了人们生病，于是人们很快找到了治病的良方，无数的病人不再遭受痛苦的煎熬。



那么，假如我们对于合作的秘密知道得更多，人类是不是会从某种什么就煎熬中获得解脱，或者创造出一种新的财富？我认为这样的研究不会自然出现，因为它需要我们付出努力。

因此，在此我诚挚邀请大家与我一道加入探索者的行列，共同开启这一合作的项目。谢谢大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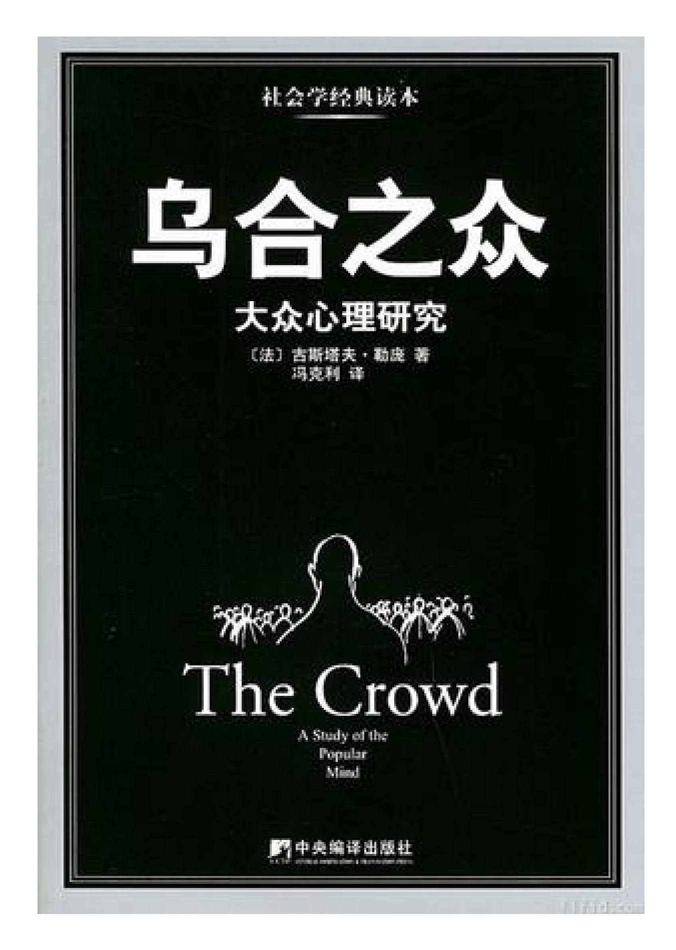
（本文来自译言网，译者：Tony Yet）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我在中國
論壇
Co-China

荐书：《乌合之众》



作者：(法)古斯塔夫.勒庞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副标题：大众心理研究

原作名：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译者：冯克利

出版年：2004-1

页数：183

装帧：平装

ISBN：97878010936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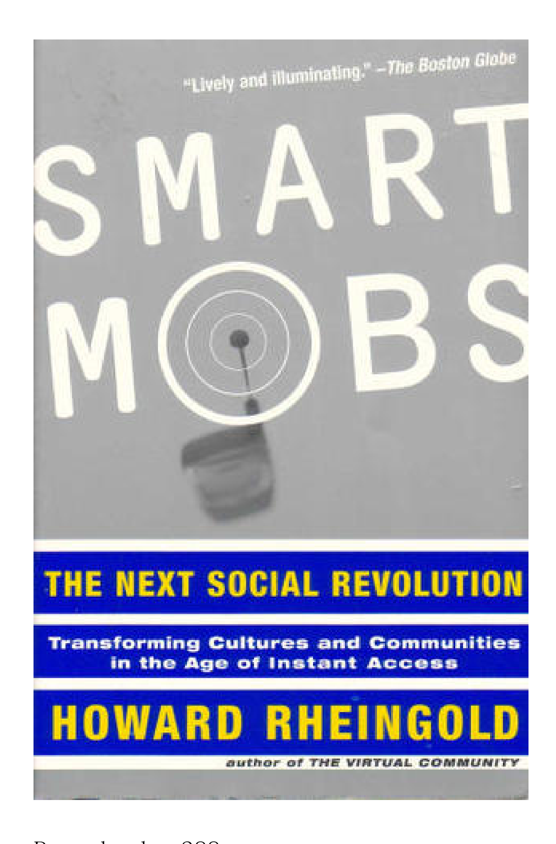
古斯塔夫·勒庞 Gustave Le Bon(1841-1931) 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他自1894年始，写下一系列社会心理学著作，以本书最为著名；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已有的著作中，最有影响的，也是这本并不很厚的《乌合之众》。古斯塔夫·勒庞在他在书中极为精致地描述了集体心态，对人们理解集体行为的作用以及对社会心理学的思考发挥了巨大影响。《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在西方已印至第29版，其观点新颖，语言生动，是群体行为的研究者不可不读的佳作。

(图书简介来自豆瓣网)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荐书：Smart Mobs: The Next Social Revolution



Paperback: 288 pages

Publisher: Basic Books; Reprint edition (October 14, 2003)

Language: English

ISBN-10: 0738208612

ISBN-13: 978-0738208619

【回到目录】



荐影：《雪国列车》



导演：奉俊昊

编剧：奉俊昊 / 凯利·玛斯特森 / 雅克·勒布 / 本杰明·罗格朗 / 让-马克·罗切特

主演：克里斯·埃文斯 / 宋康昊 / 艾德·哈里斯 / 约翰·赫特 / 蒂尔达·斯文顿 / 杰米·贝尔 / 奥克塔维亚·斯宾瑟 / 艾文·布莱纳 / 高雅星 / 艾丽森·皮尔 / 卢克·帕斯夸尼洛 / 弗拉德·伊凡诺夫

片长：125 分钟(中国大陆) / 126 分钟(韩国/美国)

为了应对愈演愈烈的温室效应，世界各国在 2014 年发射了代号 CW-7 的冷冻剂，谁知却将地球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极寒深渊。大多数的人类死于寒冷与恐慌，只有为数不多的数千人登上了威尔福德工业开发的列车，成为永不停歇的流浪者。这列火车借助威尔福德（艾德·哈里斯 Ed Harris 饰）开发的永动引擎，并且配备各种完备设施，在之后的十七年里构建了属于自己的独立生态系统，周而复始旋转在 43.8 万公里的漫长旅途中。生活在末尾车厢的底层人民一直饱受压迫，为了争取自由和权力，他们在过去发起过多次暴动，但无

疑例外均以失败告终。这一次，拥有领袖气质的柯蒂斯（克里斯·埃文斯 Chris Evans 饰）试图找到被囚禁的安保设计师南宫民秀（宋康昊 饰），借助他之手打开通往首节车厢的重重大门，推翻威尔福德的统治。新年伊始，一场血腥革命正在进行……

本片根据根据法国漫画《Le Transperceneige》改编。

(影片简介来自豆瓣网)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一群人的得失┫

张铁志：这个城市的灿烂不致于光辉至此



张铁志，台湾政治与音乐评论人，作家，现为香港《号外》杂志主编

“

我想，华人音乐世界中，在达明一派 2012 年的演唱会之后，很难再有一场演唱会能像这场黄耀明在香港举办的“太平山下”，可以让人热烈地舞动，让人享受高水准的视觉效果，却又能深刻、精准地切入与反思当下香港的矛盾、焦虑与期盼。

”

【前言】

我想，华人音乐世界中，在达明一派 2012 年的演唱会之后，很难再有一场演唱会能像这场黄耀明在香港举办的“太平山下”，可以让人热烈地舞动，让人享受高水准的视觉效果，却又能深刻、精准地切入当下香港的矛盾、焦虑与期盼——不论是透过黄耀明的歌曲、说话或者大屏幕上精彩政治波普的视频。不会有，是因为其它主流歌手（包括两岸三地）不敢这么贴近政治也未必有这种思想高度，而抗议性质的歌手很难做到这么高质素的视觉和声光效果。

于是，我们在演唱会上 party、思索、感动，最后带着希望回到真实世界。

演唱会开始了。

开始前，舞台上的大屏幕和现场装置，是仿似九龙城的旧唐楼与官塘一带的七层徙置区。那是黄耀明成长的地方，是正在消失的老香港。

演唱会开始。屏幕上出现大段文字：

洋紫荆又称香港兰，全球首次于香港发现。1965 年，洋紫荆正式被定为香港市花。

……



有人说，其实当初选中洋紫荆为香港市花的人，是否对洋紫荆不能生育繁衍的背景和历史一无所知？又或者反而正知道，那身世的混杂嫁接、出奇的艳丽、凭空而来忽然出现的来历，繁衍而又无法自身完成，原来每一项特质都正好与这个岛屿的身世传奇不谋而合。最后洋紫荆被镀成金身，矗立在湾仔海旁，又是历史另一章的开端了。

这段话是这场演唱会的中心命题，洋紫荆将是演唱会的主要象征，而香港的身世——过去、现在与未来，是这场演唱会的主轴。这个香港故事将由黄耀明的个人生命史来体现。接下来又是一段：

1962年6月16日，黄耀明于九龙竹园一间留产所出生。

同年同月，商业一台为广播剧“劲草娇花”推出同名插曲，结果大受欢迎，唱至街知巷闻。被评为香港第一首广泛流行的广东歌。

78天后，台风温黛袭港，十号风球。造成183人死亡，108人失踪，72000人无家可归。是香港战后破坏力最大的台风之一。

《劲草娇花》成为黄耀明今次演唱会的第一首歌，一首对他个人，对香港粤语流行音乐文化，都意义深远的歌。

演唱会的第一段是他个人的青春史，他在成长时期吸收的国粤语电影、音乐等流行文化，以及西方六十年的音乐。屏幕上是邵氏明星、邓丽君，是Bob Dylan、Cliff Richard，以及六十年代西方街头抗争的画面，而他演唱《不了情》、《忘不了的你》，以及“Sound of Silence”等歌曲。

“我的成长就系流行曲、电影、明星同埋幻想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他说。

然后，他说到在青少年时参加了教会，因为教会有好多音乐好多诗歌。他喜欢上了一个男生，那是他的初恋，但教会辅导员说，青春期过去，一切都会恢复正常。

于是他“离开这间只是捆绑我而不是释放我的教会……走向大观园走向花花世界，从此以后亦没有回头望过一眼”。

进入80年代，是黄耀明的情欲盛开时期，他以电音演出一连串西方经典同志歌曲，他的“解放组曲”：《It’s a Sin》、 《Relax》、, 《YMCA》、 《Express Yourself》——屏幕上不断出现express yourself （展现你自己）。在演唱《你真伟大》时，大屏幕上出现那些“大人物”的安迪·沃霍尔式的头像英国女王、毛泽东、邓小平等，还有许多人的金句：韩寒、崔健、马丁路德金、王尔德。最后一句是：“达明一派说：恐怕这个璀璨都市光辉到此。”



我们心中一惊。

第三部分 90 年代是他个人对爱欲执迷时期，他唱《迷恋贺尔蒙》、《爱到死》、《漩涡》…《春光乍泄》。1997 年，爱恋结束——中英之间的爱恋。

第四部分是回归后的香港。大屏幕上快速闪过香港近期重要的新闻人物和中国的敏感词人物。黄耀明唱起周耀辉作词的《下流》，原本是阶级问题，但此时的“我们”是所有为了理想的抗争者。

林夕作词的《太平山下》这首歌可说是最能反应当下香港时代精神的歌曲：

这个家快不似家/似将要迁拆/倾塌改建的大厦

有住客在对话/要是对骂太嘈/有食客捕杀乌鸦

每天高唱我哋大家/歌舞总要升平/配合这混世荣华

要合唱亦唱完/要颂赞亦赞完/最后也就变哑巴

睡着便退下 造梦就上吧

歌名《太平山下》其实是对比更早的一首歌《狮子山下》，那是 1979 年香港电视剧《狮子山下》的同名主题曲，由黄沾作词、顾嘉辉作曲、罗文演唱。自此剧后，《狮子山下》成为香港精神的代表，一种只要努力奋斗就能成功追求香港梦的精神。因为在 70 年代，一方面香港逐渐确立经济繁荣的地位，另一方面，香港人也开始建立起“香港人”的自我认同。那也是黄耀明的青春时期。

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对

……

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地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只是，在 21 世纪初的香港，没有人会再相信狮子山下的神话了——除了政府。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巨大的地产霸权、大陆和香港的种种矛盾、政治前景的不明、自由的被侵蚀，香港已经成为一个“愤怒之岛”。

“现在是烂斗烂 只得这紫荆花金光灿烂”（《太平山下》）

在演唱会快结束时，黄耀明说，现在是香港艰难的时刻，他不想演唱会给人感觉是一种虚假的快乐。“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一种天真的希望，天真的乐观。我们需要为香港坚持，为香港发声。”他送给大家一首乐观的歌：《一一 2017》

一息间一切再光辉要是你今晚要我留低



然后我着礼服你换造型快要到达这 2047

来三二一一一一笔勾消一切更光辉灿烂那一刻要有座位

然后我要快乐你要和平快要兑现今晚要做势

然后永远快乐继续和平快要兑现今晚要做势

【尾声】

其实黄耀明的个人叙事和香港的大故事确实有一致的精神：他的同志认同建立过程是要打破那些枷锁与束缚表达自己、追求自由，同样的，当香港被捆绑得越紧时，也越要勇敢地表达自己，才能得到自由。

只要你愿意，这个城市的灿烂，就不致于光辉至此。

他们往上奋斗/我们往下漂流/靠着刹那的码头/答应我/不靠大时代的户口

他们住在高楼/我们躺在洪流/不为日子皱眉头答应你/只为吻你才低头手牵手

演唱会的同名主题曲：《太平山下》终于出场。萤幕上是开着天窗的报纸，然后被填上几周前的香港集会游行照片：They can’t kill us all。所有香港人都知道这句话的意义。然后一份份二次创作的虚拟报纸：“日月报”、“香岛日报”、“禁果日报”、“城报”等突然变成：“人人日报”，黄耀明在“人”字之前挥舞着大旗。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张天潘：群体的狂欢与个体的迷失



张天潘，书评人

> “
> **轻信，易受暗示，在群体领袖们（英雄）的膝下被驱使和被控制，极端、情绪化特征显着，个体没入群体立即就成为失去了灵魂的空洞躯壳，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对领袖的追随，而这缺失理性思维的轻信更是谣言在民众中得以快速传播的基础。而谣言在整个社会大众中的成功运作正是几乎所有社会群体事件的主要来源。**
> ”

对群体心理的社会学研究和心理学探索，有助于对当前弥漫在网络上的群体行为，以及常常发生在生活中的群体事件。

群体是矛盾性地存在着的，一方面他们是作为民主运行的物质基础，同时，也还是暴虐、产生群氓行为的温床。可以说，群众（或民众）是一个左手撑着盾牌，右手握着利矛，然后左手与右手激烈厮杀的一个矛盾共同体。

有三本来自法国的书，可以当作三部曲来看，第一部是《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第二部是《黑寡妇——谣言的示意及传播》，第三部是《群氓的时代》，通过这三本书，可以对群体或群众有个更好的了解，能够形成一个清晰的认知脉络，以及可以助于理解当前发生的很多社会事件与网络事件。

一、乌合之众的力量

在个人放置在群体中，就像“傻瓜、低能儿和心怀忌妒的人”一样，在摆脱了个体卑微无力受压抑状态后，会爆发出一股残忍、短暂而有威力巨大的能量，“个人可以接受矛盾，进行讨论，群体是绝对不会这样做到的”。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

“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



所以理性的解释，在这个特定的时刻，不会发生任何澄清事实的作用，反而会引起更大的负面效应。“不能绝对地说，群体没有理性或不受理性的影响。但是它所接受的论证，以及能够对它产生影响的论证，从逻辑上属于十分拙劣的一类。”“乌合之众”更愿意相信信誓旦旦出言不逊的夸大其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

勒庞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惊恐不已，他嗅觉敏锐地对现代化过程中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发了一声悲观的惊叹。秉承着法国自由中产阶级传统的他，四方出击，用词激烈粗俗，抨击革命、社会主义和民主议会制的本身难以克服或者极端情境下的缺点。于是这就成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所推崇法西斯主义理论之一。尽管这是严重的误读，但断章取义地被法西斯利用，也导致了他在随后在时代中，受到冷落，默默无闻。不过事实上“从勒庞的作品中，我们知道他宁愿选择民主的苦恼，而不是独裁的宁静”（赛奇·莫斯科维奇）。

但群体的无意识和非理性，不是简单的通过群体集合就能酝酿而生，正如广场上每天都有大量的人来来往往，却不会每天都发生群体事件，只有通过某些特定的因素催化后，方能产生勒庞所担忧和指责的那种乌合之众的力量：“群体无疑总是无意识的，但也许就在这种无意识中间，隐藏着它力量强大的秘密。”——而这个催化剂，往往是来路不明却极具煽动性的谣言。轻信，易受暗示，在群体领袖们（英雄）的膝下被驱使和被控制，极端、情绪化特征显着，个体没入群体立即就成为失去了灵魂的空洞躯壳，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对领袖的追随，而这缺失理性思维的轻信更是谣言在民众中得以快速传播的基础。而谣言在整个社会大众中的成功运作正是几乎所有社会群体事件的主要来源。

二、谣言：情绪的传染

在《黑寡妇》一书中，作者引用了一个著名事件引发的谣言：

1987 年 12 月 20 夜晚，菲律宾客轮“多纳·帕兹”号从莱特湾出发驶向马尼拉，途径塔布拉斯海峡（处在菲律宾中部）时，同“维克托”号油轮相撞发生火灾，造成 4000 左右人死亡。于是谣言就应运而生。这无疑是先从马尼拉以南的一些村庄传出来的，在那里，漂浮着成百具尸体，之后传到了首都，而且变得越来越离奇。一些家庭妇女说她们在拉普拉普鱼的肚子里挖出了一支手指，或是一只耳朵，或是一只指环。这都是饥饿的鱼群从漂浮在朱沙鄢群岛海域的尸体身上吞下的。

之后，一位名叫帕诺的夫人有一天给一家地方电台打电话说她在拉普拉普鱼的肚子里挖出了一只男性生殖器。于是政府必须出面了。渔业局的一位专家发表讲话说：“这种鱼是不大可能吃腐肉的……而且她们的嘴也太小，吞不下这样大的块儿”。渔业局还发表了一份公报，肯定《马尼拉市场上的渔产品 80%都经过了检验》。另外，公报进一步说，在首都销售的海产品一半来自远离出事地点的巴拉望岛，其余则几乎来自位于更南的棉兰老岛。



尽管有权威官方出面进行论战和辟谣，然后谣言还继续在传播。后来这被怀疑是鱼贩子的传统敌人的肉店老板们出于自身利益进行的败坏拉普拉普鱼声誉的“黑色宣传”。这个谣言被另外还有一个需要交待清楚的是，拉普拉普鱼，是以用标枪杀死 1521 年发现菲律宾的麦哲伦的一位部落首领的名字命名的，至此，拉普拉普鱼就象征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抵抗。这拉普拉普鱼本身就充满着复杂的象征意义，所以更加容易成为谣言发育的母体。

弗朗索瓦丝•勒莫说：谣言传播的信息存在二律背反：一般情况下，我们不将谣言的两个组成部分分开：叙述（或报道的故事）和论说（或围绕这则“新闻”做的评论），论述是保证叙述的社会存在。

勒莫在其解析谣言运作传播机制的《黑寡妇——谣言的示意及传播》中列举的菲律宾食人鱼事件和法国盆栽黑寡妇（毒蜘蛛）事件都是信息二律背反的分析样本。谣言作为煽动群体情绪的主要手段，在不同的时期，发挥着不同的效果。在今年有关“法国家乐福”诸多谣言当中，爱国这个概念，翻来覆去被炒作了无数次，最后那些无自主意识的群体，特别是年轻的学生，都搞不清楚是拒绝家乐福还是拒绝抗议，哪个是爱国，最后不欢而散。——这再一次证明了群体，作为一个含有贬义词的名词“乌合之众”进行概括，并不是无凭无据。

三、群与氓的会合

《群氓的时代》这本书是作者在卢万大学系列讲座的基础上补充整理而成的著作。冷峻是本书最大的特点，赛奇·莫斯科维奇在书中，多处大段大段地引用他的前辈勒庞的论述，这揭示了他对勒庞的忠实追随和继承。但是他同时还汲取了塔德的思想，特别是对弗洛伊德的深度挖掘，加强了本书的理论综合性，以及独特的视角，这些前辈的为他提供了“调色板和颜料”。

他考察了民众的特征，指出群体质料是“即冲动又保守的民众”：

群体质料是个体转化为群体。群体有哪些特征呢？一方面，他们是冲动的，公开接纳所有的建议；另一方面，从本质上说，他们又是极端主义者。他们对建议的公开化意味着他们受内在冲动、本能反应甚至外部的刺激所支配，没有任何自控能力。他们这种永久性的接纳状态意味着他们置身于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事件中，他们的反应也将是过分的。

群体形式是“即教条又空想的民众”：

群体总是需要精神的一致性和情感的稳定性来帮助他们理解所发生的事情，帮助他们弄懂易变而又复杂的宇宙，因为群体似乎只是发生的事情，帮助他们弄懂易变而又复杂的宇宙，因为群体似乎只是茫茫宇宙的玩物而已。信仰的教条性能满足这种需要，这种教条与



孩子们所体验过的教条很相似。……可以得到所期望的那种一致性和确定性。信仰还排除任何争议的可能性。……他们既缺乏必要的客观性，也没有对反映进行自我检测的能力。

民众向往安慰、平静的幸福生活，对于不公平和腐败的绝对愤怒，反映出民众乌托邦式的空想，一旦这个乌托邦遭到破坏，或者长期持续的失望，就会冲动，爆发剧烈的反抗举动，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群体的二重属性，非此即彼的二元极端，往往只要一丁点的火花（此时往往是谣言的流行），就会驱动着群体向群氓的靠近，仿佛在深秋的大山中，让下一根烟蒂，就足以燃烧整个森林。群向氓的转向，预示着开始了枯木与火柴的亲密会合。

群体的属性，很难被历史大浪淘沙而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恰恰相反，它只会不断地更新历史，借助不断进步的新技术和新载体，进行形式上的升级。而这些新的技术和载体（如网络），预示着一个新的群体时代已经来临。它是民主民生改善的主力军和推进器，又是破坏性和摧毁力十足的核武器。在这个历史车轮滚滚的路旁，散居但又能迅速集合的群体（乌合之众）已经摆开了一张张的桌子，就等着上好菜好酒，然后火速现身，进行一场又一场的饕餮盛宴和狂欢。（来源：时代信报）

书籍信息：

1、《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法）古斯塔夫·勒庞着，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定价：16 元。

2、《黑寡妇——谣言的示意及传播》/（法）弗朗索瓦丝·勒莫着，唐家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1。定价：11 元。

3、《群氓的时代》/（法）赛奇·莫斯科维奇着，许列民、薛丹云、李继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3。定价 29 元

（本文来自一五一十部落）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郭于华：个体命运与时代


郭于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当红歌再度唱响之时，过来人发现，那些极端的革命文艺表达方式会让他们“翻涌起一股呕吐感”，但同时他们“个人的情绪记忆，都附着在一种无处不在水银泻地般的意识形态文化上了”，除此“竟然没有我们自己的纯正的洁净的文化载体，来记录下我们的生命”。当年的红歌与一代人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最绚丽的青春、最柔软的心田交织在一起，悲剧性地相伴相随，那种爱恨交织令未经历者感到匪夷所思。

知道作家胡发云，是从读《如焉@sars.come》开始的，《迷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年版）则是他多年后的又一沉重之作。评论一部小说，本不是社会学研究者的“本职”，但这部书写文革经历的作品，涵纳了作者的社会关怀与对一种“红色文明”的学理解剖，这也同样是我多年从事口述历史研究的主旨与内在冲动。正如胡发云曾经对《中国新闻周刊》所说的：“当这个社会的历史记录缺席的时候，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起了代偿的功能。我们应该留下一点时代的印记”。好的文学作品是人们灵魂的讲述，是历史记录和学术分析的叠加，而只是表述方式不同而已。

个体命运与时代大潮

《迷冬》的副标题其实是作品的主题，“青春的狂欢与炼狱”，作者讲述了在文革发端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群还是中学生的少男少女们的经历。我相信《迷冬》中的每个人物都有现实中的原型，不同个性、不同特长、不同背景的人们被卷入时代大潮，演绎出色彩斑斓的命运画卷。孤独、有些“颓废”的音乐天才，出身革命家庭却在文革第一波遭遇惨痛变故的少女，以职业革命家状态投入运动的中学生，出身贫寒却偶然进入音乐殿堂的兄弟，……一群出身非“红五类”的少男少女们，各怀思虑、各具才华，自发组成了“独立寒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他们像是被时代大潮抛出在外，旋即又被卷入其中的一颗



颗沙石，以“文艺”的方式历经那场毁坏文化的大革命带来的诸般磨砺。他们在动荡、流离、暴力、恐怖和和迷茫中，也同时收获了青春期必有的爱情、友谊和美丽。花季少年经历了正常社会中的人一生也不会有的摧折；命运被无情地拨弄和改变，而且是所有人的命运。

那是一场由最高统治者发动并“设计”的“大革命”，堪称社会工程或者社会实验，每个普通人或被动或主动地都被卷入其中，成为试验品，甚至成为相互战斗的炮灰，而他们的“目标”却是共同的，都是为了保卫伟大领袖和他的思想以及路线。每个人的命运、每个家庭的遭际全然改变，而正是因为这种全面卷入，个人经历本身就成为一段宏大历史过程的构成部分，或者说那所谓的宏观社会历史进程正是由无数小人物的经历形成和推演的。

记录和分析个人历史的背后有着深厚的学理内涵。个体遭遇与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可以通过一个个看似卑微琐碎的故事得以呈现。这需要社会学的想象力与洞察力，贯穿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屏障。揭示个人苦难的社会性，是法国思想家布迪厄重要的方法论主张，他认为，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个体遭遇的困难，看似主观层面的紧张或冲突，但反映的往往是社会世界深层的结构性矛盾。由此，个人记忆和讲述就有了历史与社会的意义，个人经历应该也能够成为大历史的构成部分。我们同时要意识到，记忆被权力控制，记忆也被权力规训。保罗·康纳顿在探讨“群体的记忆如何传播和保持”的问题时论证，“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记忆是“社会结构的惯性”造成的，由此，个体层面的“个人记忆”，“认知记忆”和“习惯行为模式”经由“纪念仪式”、“身体实践”及其中象征的操演而形塑个体记忆；这里操演之手当然无疑是权力。正缘于此，未被完全驯服的个体记忆才尤为珍贵和值得重视。

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构建历史（making history from everyday life of common people），使个人讲述成为一种历史证明，为千百万普通人民的生存作见证，是文学和历史以及学术都应该承担的使命。

并非所有的经历都是人生的财富

《迷冬》是作者对特定的一群人所经历文革的记述，也是反思的产物，凝聚着作者对于过往经历的理解和思考。这种思考在文革进行时就开始了，这一代人是在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中长大的，充满着浪漫主义的对革命的憧憬和与革命相伴的爱情的渴望；然而当“革命”真的降临时，带来的却是最落后的血统论，丑陋与野蛮，离弃与背叛，美好的人性的东西统统被砸烂。主人公多多正是在这样的现实中“渐渐成为一个反革命者，他痛苦地抵牾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革命，连同它所催生的那些语言，图画，音乐，舞蹈……都让他厌恶至



极”。夏小布，从名字便知其出身革命家庭，从运动最初的革命造反小将一夜间变成“黑五类”子女，父亲自杀，她从切身之痛中长大，成为干练、有主见又大气的“独立寒秋”的领导者。而他们在当时的迷茫和有限觉醒，大多与音乐和阅读带来的启迪分不开。更为自觉的思考是宫小华和父亲宫克在西南逃亡之旅中发生的，女儿问：他们为什么要把你……变成一个坏人？父亲答：他们需要这个世界上有坏人。女儿说：为什么？父亲说：那样，就可以证明他们是好人。女儿又问：大家都是好人不行吗？父亲答：不行。女儿：为什么？父亲：那他们就没有控制这个世界的权力了。这样弯弯绕绕的话女儿居然听懂了：其实他们自己是坏人？

当然全书都不妨视为作者凝聚了全部心血对于那场“大革命”的痛彻反思，而这样的记忆、表述和思考在今天的中国仍属罕见。

就常识而言，一场全民族的灾难过后，应该有全面的记录、探讨、呈现真相和深入反思，以避免悲剧再度上演。无论作为亲历者还是后来人我们不应对前人的经历、功过、是非置若罔闻。从哲理层面而言，我们需要有社会记忆，它是整个民族的良知，也是人性道德的基础，更是社会正义的理由。而我们的社会却似乎特别健忘，不该忘记的忘记了，应该清楚的模糊了或者扭曲了，这是权力支配历史和消磨记忆的过程和机制。一如奥威尔的《1984》中所描写的达到极致的权力技术。我们常见的说法是“向前看”（或者向“钱”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是“搁置争议”、“不讨论”；在一些文学和历史作品中，也时常出现“青春无悔”，“苦难是人生的财富”，“宽恕比自由更重要”一类的心灵鸡汤。然而一场浩劫，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历程，那种深厚、那份沉重，岂是一句“青春无悔”那样简单和轻薄？追寻历史的真相，探究历史过程的逻辑和机制，揭示制造苦难的制度原因是社会科学的学术使命与社会担当，如若学术研究不能承担这样的任务，反而成为制造迷雾、扭曲历史的权力工具，那么社会失忆、社会失语和社会丧失是非判断就是必然的结果。

普通人所经历的苦难，只有进入历史，也就是被记录、被讲述、被分析，经验教训被后人汲取，那么苦难才是有价值的，才可以是我们社会共同的财富。我们揭示社会苦难的根源，就是明了那些苦难到底是怎么制造出来的，遮蔽苦难的迷障被清除，制造苦难的机制被中止，这时苦难才不仅仅是个体的经历和感受，而是具有了一种社会的力量。就此，胡发云的写作向读者昭示了，即使作为普通人，我们也不能放弃自己的历史权利，而要像保护我们的财产权一样去保护我们历史的权利。历史的权利也是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世间生物唯有人不能过着他的生活而不讲述他的生活、不思考他的生活。



最近发生的当年文革中的红卫兵向老师、同学的道歉之举，是在他们年近古稀之时忏悔的开始，但真正的反思和彻悟尚未开始。道歉应该肯定和鼓励，并且应进一步推动全社会的反思，特别是制度层面的思考。对于亲历的历史必须有反思，才会有觉悟，否则几代人所经历的苦难就烟消云散，毫无价值。谈到宽恕，当然必要，但宽恕并不是以忘却为前提的；宽恕必须以真相的呈现、是非的判断、真诚的道歉为前提，有真相、有反思才会有宽恕，在牢记历史教训的同时才能放下历史共业的负担。我们必须真实而彻底地了解和记住文革，文革的悲剧才不会重演；中国人民必须要过这一关，迟早要过这一关，我们逃无可逃。唯有经过记忆、记录、表达和反思，才能达到彻悟，才能明辨是非善恶，成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正常的国家，融入人类文明的主流。

柔弱和美丽终将不可战胜

“迷冬”时节，青春在凄风苦雨和腥风血雨中依然绽放。正如作者写到的：“生命的欲望，总是能够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倔强地表达出来”。“这些十四五岁到十八九岁的少男少女们历经那么多于他们的年龄来说是太过于残酷的打击与折磨后，仍在苦苦寻找理解、温情，寻找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自己的生存之路”。

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代，是一个意识形态强暴文化的年代。“破四旧”，“反封资修”，以野蛮和蒙昧的方式几乎将一切文明之物踏入泥沼。全国人民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三战”和“红歌”、“忠字舞”可以“欣赏”。在这种凋零和粗鄙的环境中，少年们的音乐、文艺之芽在悄悄生长，“音乐艺术常常能说出各人所需要的东西”，在文艺的慰藉下，温情，浪漫，友爱，爱情等青春应有的一切情愫顽强地抬起头来，弱弱地、小小地温暖着一群少年的心，让他们彼此珍惜并保留人性的温度。虽然这一时期的文艺无可避免地充满意识形态内容，以革命的红色作为底色，但仍微妙地潜在地影响了一代人的欣赏习惯和心智。而吊诡之处在于，多年之后，当红歌再度唱响之时，过来人发现，那些极端的革命文艺表达方式会让他们“翻涌起一股呕吐感”，但同时他们“个人的情绪记忆，都附着在一种无处不在水银泻地般的意识形态文化上了”，除此“竟然没有我们自己的纯正的洁净的文化载体，来记录下我们的生命”。当年的红歌与一代人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最绚丽的青春、最柔软的心田交织在一起，悲剧性地相伴相随，那种爱恨交织令未经历者感到匪夷所思。

在一个正常社会里，人们的生活方式、喜好偏爱，尤其是所思所想，本应该是多样的，只要是在法律的轨道内并不对他人造成伤害，多元共存是社会生态健康的基本表征。而在文革时代，人们被要求整齐划一，大一统进入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衣食住行到语言、动作，从文艺音乐到思维方式，任何不一致的都被视作弊端而加以污辱和剿灭。于是美变成了



丑，正常被视为变态，善良正义受到制裁。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多多、夏小布们和舅舅、宫克等人在创作“火在烧，铁在烧！蘸我血，打大刀！”的同时，也在看禁书、偷听古典音乐、写反诗、流连于大自然的美丽和历史文化的深厚，这显示出保持正常健康和启蒙的意义。舅舅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形象：英俊潇洒，善良又软弱，还多才多艺；尤其是他的同性恋倾向，在那个时代简直就是罪不可赦的另类异端，而他注定的悲剧命运也揭示了整个社会的极度病态，并预示着一种消灭社会文化多元性的革命不可能持续。

胡发云以近乎执拗的方式写出自己和同伴们的文革经历，没有什么东西能改变这一写作的内容，这个路子成了他的不归路。而他的执着既有对于历史责任的坚守，也出于一种信念：“人类千万年来的生活中，恰恰是这样一些最柔弱的东西，消解着革命的刚硬，粗鄙和凶残”。一如作者在《如焉@sars.come》中所说：“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斯大林不见了，贝利亚不见了，勃列日涅夫不见了，甚至如日中天的那个马雅可夫斯基也不见了，但是，安娜・卡列宁娜的美丽还在，有些柔弱得不堪一击的东西，比那些不可一世的权势要强大得多”。

在一场全民被裹胁进入的红色革命中，在横暴而又无所不至的宰制之下，那不可战胜、不曾泯灭的究竟是什么？其实无非就是人们要求有保障的生存条件，有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以及对平凡幸福的追求和对有尊严的生活的向往，这难道不是最基本、最正常的要求和人性体现？在苦难中生长、抗争，他们创造了历史，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就此而言，没有任何一种暴力能够永久地与所有人的正常要求和人性对抗、能够消灭爱情生长的力量。青春在炼狱的水火中淬炼，那绽放的生命和爱，是用青春的血液浇灌的；爱情，友情，手足之情，浪漫，纯真，信任，相互温暖……人性所需的真善美是任何强大横暴的统治机器都无法消灭的，这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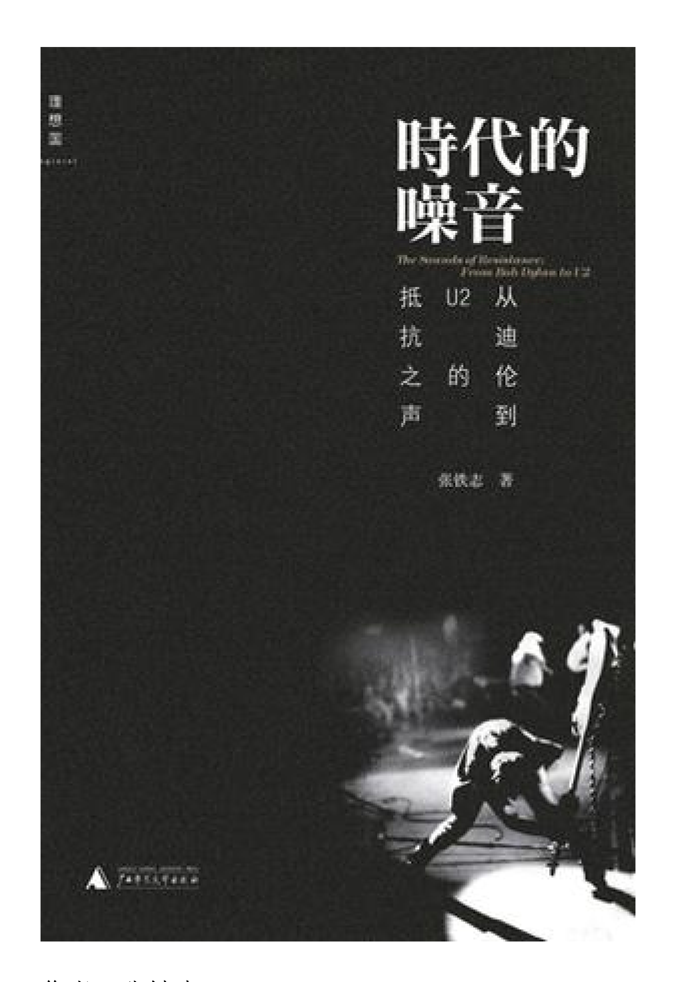
《迷冬》是“青春的狂欢与炼狱”三部曲之一，我们期待着。

（文章来自《爱思想》网，本文首发与 2014 年 1 月 27 日《经济观察报》）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荐书：《时代的噪音：从迪伦到 U2 的抵抗之声》



作者：张铁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从迪伦到 U2 的抵抗之声

出版年：2010.9

页数：280

丛书：阅读亚文化

ISBN：9787549500321

这本书的文字书写从二十世纪初到我们所处的二十一世纪，西方音乐人如何用音乐制造噪音，以反思时代、纪录历史，或者追求改变社会。



这些音乐 人包括 Pete Seeger, Woody Guthrie, Bob Dylan, John Lennon, The Clash, Bruce Springsteen, Patti Smith, Billy Bragg, U2。

除了深刻分析这些重要音乐人的创作理念，本书也试图刻划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反抗史：从二十世纪初的美国资本主义与工运早期阶段、三四十年代的左翼运动、五零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六零年代的反战运动、民权运动，七八零年代的经济转型和里根的新自由主义，以及九零年代的全球化/反全球化、战争与和平、发展与贫穷。所以这本书的读者不只是摇滚乐迷，而是一本反抗的文化史。

(图书简介来自豆瓣网)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主编：方可成

编辑：王陶陶，李佳凝，胡馨以

设计：潘雯怡，池春荣

校订：常仁豪

出品人：杜婷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请发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若订阅 pdf 版请发送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mobi 版至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epub 版至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是在香港注册的非牟利团体，论坛理事杜婷、梁文道、闾丘露薇、周保松。除了一五一十周刊之外，Co-China 每月还在香港举办论坛，并透过网络进行视频、音频和文字直播。2012 年开始 Co-China 在香港举办面向青年的夏令营，第一届主题为「知识青年，公共参与」，2013 年夏令营的主题是「始于本土：本土、国家、世界冲撞与协商」。

Co-China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co

Co-China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论坛（http://weibo.com/1510weekly）

Co-China 论坛 facebook：「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https://www.facebook.com/CoChinaOnline）

